

目錄

壹、數位傳播下的客家文化典藏研究群

總計畫主持人：郭良文教授

一、當代客家文化數位專題報導之建構與展現

計畫主持人：張玉佩助理教授

二、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料庫(II)

---開放和參與，就從金山面出發!

計畫主持人：林崇偉助理教授

貳、竹塹地區客家社會文化研究群

總計畫主持人：莊英章講座教授

一、日治時代專賣制度下客家地區的樟腦業

計畫主持人：黃紹恆教授

二、紀錄影像中的客家族群

計畫主持人：林文玲副教授

三、界線、認同和忠實性

進香，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

計畫主持人：林秀幸助理教授

四、女性、婚姻與家族

---北台灣客家女性的口述歷史與分析(II)

計畫主持人：連瑞枝助理教授

五、山歌記憶與生命史敘述：

---日治及戰後初期竹塹客家村女性民族誌研究

計畫主持人：簡美玲助理教授

六、竹塹客家三腳採茶戲的傳統與創新

--以「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與「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為例

計畫主持人：段馨君助理教授

參、客家語言研究群

客語學習系統之製作

計畫主持人：陳信宏教授

肆、學術交流

「當地知識與學院理論的對話」推廣課程(II)

-----田野工作室設置計畫

計畫主持人：莊英章講座教授、羅烈師助理教授

當代客家文化數位專題報導之建構與展現

張玉佩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計畫目的

著名研究國族認同的學者 Anderson (1991) 曾經說過，所有大於面對面溝通的社群，都是經由想像而來，而擔任此種連結想像的溝通工具，即是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使得一群原本在空間上分離的個體可以在想像的層次發生互動，人們雖身處於不同的地域或城市，卻因為共同看一份報紙，共同閱讀一本小說，或是共同參與同一個事件的討論，進而產生時間上的共時性，形成一種新的、以媒介為外圍疆界的想像社群 (imagined commun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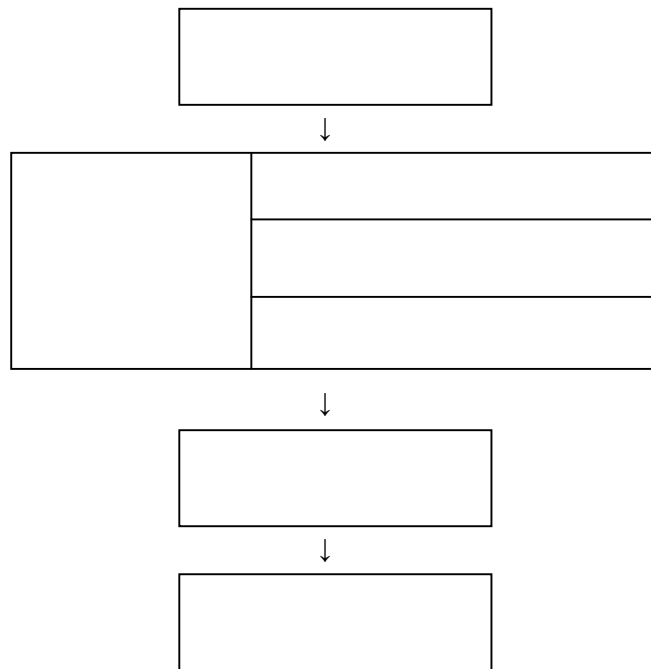
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族群融合而成之「想像社群」的社會，如何促成族群間的溝通與相互瞭解，是個重要且迫切的工作。然而，台灣當代的傳播事業體系是植基於以自由競爭市場為主要導向的商業機制，在商業機制下媒體之間的競爭以獲利為最高目標，導致集團化 (monopolies) 與寡佔 (oligopoly) 的市場結果，會使得媒介內容與形式傾向標準化與同質化，弱勢族群難以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並無法真正促成多元溝通 (Straubhaar & LaRose, 2004)。也因此，客家文化經常不是台灣主流傳播媒介所青睞的對象，社會上也經常瀰漫著對於客家文化負面的標籤與刻板印象如「嫁夫莫嫁客家郎」(張維安、王雯君, 2005) 等，因此，如何「去污名化」客家族群的社會意象，為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裡重新建構一個真誠、健康且正確族群形象，成為促成台灣多元族群溝通之刻不容緩的重要事宜。

本計畫秉持社會責任論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傳播立場，認為傳播的目的在於公共利益而非私人的商業利益，大眾傳播媒介應該負起促使弱勢族群文化發聲的責任，讓社會人們有權利可以享受多元而豐富的資訊 (Siebert, Person & Schramm, 1956)。

因此，在客委會的支持下，本計畫建置一群對於客家文化有深層瞭解的種子採訪群，針對客家文化鄉鎮展開一連串的數位專題報導之建構，透過專業的新聞專題之規劃、採訪與寫作，結合最新的數位傳播技術，讓客家文化以親近平民、生動活潑之「深入淺出」報導呈現，以期促進台灣各族群間的瞭解與溝通，重新將客家形象展現在台灣的多元文化社會。

執行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訓練客家文化深度報導的種子部隊，藉由這批同時具有採訪寫作專長與版面編纂製作專長的學員，針對客家鄉鎮製作一系列的客家文化數位報導專題。執行的流程規劃如下。



圖一：客家文化數位專題建構之執行流程圖

第一步驟，是基礎訓練與主題搜尋。在基礎訓練方面，本計畫邀請三位在台灣媒體界擁有豐富經驗與資歷的媒體人：天下雜誌資深撰稿人林照真、台灣電視文化公司新聞部資深記者顏章聖與中視新聞部資深記者劉蕙苓，協同訓練同學對於採訪規劃與報導寫作。

第二步驟，採訪寫作。根據主題，進行初步的資料蒐集、擬定實際可行的採訪計畫，並根據採訪計畫內容，進行實際的採訪。本步驟的執行過程中，將以兩到四人為一組，一部分負責文字採訪，另一部分負責影像拍攝，務必追求影像與文字兼俱，以期豐富專題報導的內容。採訪回來的資訊與材料，必須重新撰寫為生動活潑的專題報導。

第三步驟，專題版面編纂與製作。此步驟訓練種子部隊學生，具有新聞版面編纂的能力，採用之電腦軟體以當代雜誌社普遍使用之 **Indesign** 為主，促使同學能將採訪回來之文字與攝影以版面製作的方式輸出。版面編排與設計，在正規學院訓練（如政大新聞系）需一學期的時間，本計畫將採取密集、集中的訓練方式，期望同學們在短期內有成果產出。

第四步驟，公開展覽。公開展覽將分為兩部分執行，第一部份是在公共空間進行展覽，可能展覽的地點以交大為主。第二部份是以網路為主，將所有蒐集所得之素材包括報導文字、攝影影像與版面，納入本系電子報系統，在網路空間進行展演。

計畫成果

本次資料共完成 22 個專題報導。其主要報導的方向可以分為五類。

1. 語言類：探討客家族群語言的現象與危機，報導主題包括：〈客家認同危機：客家青年不說客語〉、〈客語：新語言弱勢〉、〈細味客家諺語、體驗背後生活變遷〉、〈大埔心、東勢客〉。共有 5 個專題報導。
2. 客家城鎮與建築風格：報導客家城鎮的興衰，以及建築美學的特質，主題包括：〈客家心靈故鄉：北埔〉、〈建築美濃鄉情：一窺新美濃客家建築〉、〈湖口老街建築〉、〈內灣風華〉等。共有 4 個專題報導。
3. 飲食文化：飲食文化是客家最通俗、為人熟悉的項目，本計畫特別期望能從深層社會文化的角度進行探索，其主題包括：〈清安村手工豆腐〉、〈茶與客家文化的饗宴〉、〈客家薑絲炒大腸〉、〈齊耙：無法忘懷的客家滋味〉。共有 4 個專題報導。
4. 音樂藝術：音樂與藝術，可展現客家文化美麗的一面。在音樂方面，我們完成〈鄧雨賢：用音樂寫歷史〉、〈好客樂隊、交工樂隊〉、〈童言童語、謠望客家〉等 3 個專題，舞蹈方面則有〈新竹客家舞蹈團〉的報導。
5. 生活與宗教：當代客家生活文化層面，是本計畫亟欲藉由實際的採訪與報導探討的部分，目前完成〈客婆、閩媳：文化大不同〉、〈客家硬頸、生生不息〉、〈環境改造新一代、客家文化流失〉、〈客家社團新問題：世代交替遇瓶頸〉、〈義民信仰、褒忠精神〉與〈客家族群、遇傳承問題〉等 6 個專題，討論焦點在於傳統客家文化精神與世代交替過程所產生的問題。

各專題報導內容，摘要如下。

1.客家認同危機：客家青年不說客語（語言類）

新一代客家人由於過去之歷史因素，對於自己的母語失去相當程度的熟悉。近年來族群自我認同重新獲得重視，不啻為客家文化與語言振興的契機。客語與客家文化需要更多的文化流通管道，才能由舊世代順利傳承至新世代。

2.客語：新語言弱勢（語言類）

在政府大力推動中小學進行母語教學的同時，客語竟成為語言教學上的弱勢，除了對於實用性（閩南語的強勢）考量外，家長的態度亦為重要關鍵。事實上，母語教學並非只有著工具性意涵，如何將語言與文化傳承確實融合才是客語教學推動的核心意念。

3.細味客家諺語：體驗背後生活變遷（語言類）

客家諺語反映了客家思想純樸與刻苦耐勞的特性，多數帶有評議的特色。客家諺語的題材多取自客家生產生活，大致分為社會諺語和生產諺語兩類。社會諺語包含生活倫理和時局批評等，生產諺語則包含與農作有關的事物。由於時代變遷，客家諺語由於客語人口減少和舊諺語無法反映現代生活等原因，逐漸消失。諺語是了解文化意涵的重要題材，有其存在與保存的價值。

4.大埔心、東勢客（語言類）

東勢地區特殊的大埔腔與較盛行的四縣和海陸不同，其來源是廣州大埔，故在語言體系與生活風俗上接獨樹一格。近年由於社會變遷，使得本來族群就稀少的大埔客家文化面臨難以存續的問題，亟需進一步的推廣與保存。

5.客家心靈故鄉：北埔（客家城鎮與建築風格）

北埔過去由於地形封閉與交通阻塞，當地語言與古蹟得以完整保留。在政府大力倡導社區總體營造之下，北埔成為熱門的人文茶莊景點，但觀光人潮也造成這個小鎮的文化保存隱憂，如何取得文化與經濟上的平衡，成為一大課題。

6.建築美濃鄉情：一窺新美濃客家建築（客家城鎮與建築風格）

伙房（三合院）、菸樓、敬字亭、東門樓是美濃客家舊式建築的重要元素。隨著時代變遷與安全性的考量，現代建材逐漸和當地傳統建築交融。傳統建築象徵著客家宗族情感，現代建築則是多了分安全性，如何尋求文化保存與實際需求的平衡點，有待政府、專家與當地居民的共同努力。

7.湖口老街建築（客家城鎮與建築風格）

老湖口的繁華，因鐵道而起，也因鐵道而落。老湖口的建築風情因鐵道而起，因鐵道的西移而存續。湖口老街混合著閩南、客家與天主教文化，別有風情，過去也曾是熱門電影取景地。面臨亟需拓展觀光，振興老街風采的現代，如何妥善保存其韻味，卻又能享受現代化的便利，成為需要智慧與時間運作解答的課題。

8.內灣風華（客家城鎮與建築風格）

內灣曾因為樟腦業與林礦業成為高度發展的城鎮，這個小山城因此得到「小上海」、「小台北」的美名，民國七十年代後，內灣開始沒落，但九十年代初由於以漫畫家劉興欽的阿三哥為主題重新包裝，加上油桐花與螢火蟲觀光的興起內灣風華再現，成為一個具文化、生態與商業特質的新生城鎮，以觀光重振風采。

9.清安村手工豆腐 原客為伍（客家飲食文化）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是一個特殊的村落，泰雅族、客家人與賽夏族多年來在此村落共存共榮，甚至是聯姻而血脈互融。當地以一家老豆腐店為中心成為熱鬧的市集，民國九十年更在政府扶助下形成了豆腐美食街，成為新文化景點。

10.茶與客家文化的饗宴（客家飲食文化）

日治時期，新竹是重要的茶葉產地，丘陵地上隨處可見茶園與茶莊，但隨著戰亂與國際競爭，新竹的茶產業逐漸沒落。但峨眉地區仍有茶農為了保存至茶葉而努力，東方美人茶結合了現代化行銷，為傳統客家茶產業注入新生命。

11.客家薑絲炒大腸（客家飲食文化）

薑絲炒大腸是客家四炒之首，綜合了鹹、酸、辣的客家美食元素，不但美味，而且補身。但烹調尚求技術，如何將不易清理烹調的大腸處理得宜，可就是這道菜成敗的最大關鍵了。

12.齊耙：無法忘懷的客家滋味（客家飲食文化）

齊耙就是一般人口中沾花生粉的客家麻糬，其特殊的滑 Q 口感，使之成為傳統市場與老街的熱賣點心。其實齊耙原為早期客家人較為困頓時款待來客的食

物，隨著時代變遷，齊耙的吃法更為多元，鹹甜皆宜。但目前機械化的挑戰是這個傳統美食在傳承上的一大考驗，有待進一步的推廣與保存。

13.鄧雨賢：用音樂寫歷史（音樂與藝術）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在台灣音樂史上佔有特殊地位——他用閩南語歌謠，細述客家風情。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等皆為其膾炙人口之作品。

14.客家搖滾、音樂很好客（音樂與藝術）

好客樂隊的音樂結合了客家山歌、爵士與搖滾的元素，以揉合創新的風格，將客家民謠重新演譯傳唱，承接了交工樂隊的意念，將新時代的客家精神展露無疑。

15.童言童語、謠望客家（音樂與藝術）

客家童謠是一組押韻的文字，過去祖輩們以編童謠的方式作為語言教材，將日常生活事物融入其中，達到教導兒童賦詞能力與人生道理的目的。客家童謠具體而微地表現了客家傳統風土民情，除了作為好的研究材料之外，也能成為現代兒童鄉土教育的優良教材。新竹縣峨眉國小推廣客家童謠有成，該校成立之「後生」合唱團透過教唱客家童謠，落實了母語教學。

16.新竹客家舞蹈團（音樂與藝術）

新竹客家舞蹈團由留英的呂琦悅發起，結合戲劇與傳統舞蹈，為客家傳統文化注入新生命，透過孩童成員的參與，語言與藝術漸而傳承。

17.客婆、閩媳：文化大不同（生活與宗教）

客家族群早年因生活困頓，年輕力壯的男人需到外地拼，女性經常扮演持家之角色，由於傳統經濟上的因素，客家媳婦成為婆婆時，為了家庭生計延續，對於媳婦的訓練與要求故苛刻許多。現代由於交通發達，出外發展機會多，客閩通婚情形出現，在文化習俗衝突下，婆媳的相處成為新的重要議題，但最基本的原則是將心比心，客婆並非天生刻薄，以同理心調適心態，家庭生活才會和諧。

18.客家社團新問題：世代交替遇瓶頸（生活與宗教）

早年客家社團主要是為了互助與聯絡感情而生，近十幾年來則開始在地方文化保存上便演著重要角色，九讚頭文化協會為其中一代表性的例子，透過鄉里活動，將客家藝術保存推廣。但目前台灣的客家社團面臨了成員老化與其他外部因素衝擊的問題，有待更進一步的耕耘與努力，用「心」與「新」突破瓶頸。

19.環境改造新一代、客家文化流失（生活與宗教）

目前台港澳地區客家人口均佔當地人口之二成多，由於為了順應當地生活，許多客家人努力適應環境的同時，逐漸對於自身原生文化觀念產生薄弱不足的現象。由於沒有明顯的客家群居地(以香港為例)，許多新一代客家人鮮少強調自己的身分，所以為了防止文化因此消弭，除了在外方面努力保存客家文物與語言之外，加強年輕一代客家人的自我認同觀念更為重要。

20.義民信仰、褒忠精神（生活與宗教）

過去客家先民群聚而居，一同抵抗外敵，捍衛家園，尤以清朝康熙年間林爽

文事件為著名事件，客家勇士忠勇衛土，戰亂平定。為了感念先人忠勇精神，紀念這些義民的廟宇在桃竹苗地區紛紛成立，成為客家人信仰與生活的重心。每年的義民祭亦為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的重要活動之一。

21.客家硬頸、生生不息（生活與宗教）

「硬頸板」原是客家長輩對不知上進的晚輩的罵詞，但由於時代變遷與社會價值轉換，加以客家文化面臨重新振興的時機，硬頸被重新詮釋，象徵著不屈不撓意志，對於發揚客家文化與增強對自己認同勇敢堅貞。這種正面的詮釋，提供當代客家人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期待與信心。

22.客家族群、遇傳承問題（生活與宗教）

面對客家文化的衰退，眾多客家文史工作者均試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客家文化的復興。本專題採訪廣泰成文史工作室的黃卓權、吳聲宏與陳俊光，以及從事客家影像工作的陳炳火等人，暢談對於客家文化推廣工作的各個困難與解決方式。

參考文獻

交通部統計處（2005 年 5 月 25 日）。〈台灣地區民眾使用網際網路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取自於 2005 年 10 月 24 日，

<http://www.motc.gov.tw/hypage.cgi?HYPAGE=stato3.asp>。

張維安、王雯君（2005）。〈客家意象：解構『嫁夫莫嫁客家郎』〉。《思與言》，34（2）：43-76。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raubhaar, J. & LaRose, R. (2004). *Media now: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 and technology*.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成果摘要

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料庫(II)

--開放和參與，就從金山面出發！

林崇偉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一) 研究目的

本計劃是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之「數位傳播下的客家文化典藏」整合型研究計畫的資訊技術核心。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料庫」之數位典藏相關技術方法、開發數位典藏資訊系統，同時並嘗試以本計畫有系統推動客家文化學院之青年學子參與客家社區的數位傳播發展。

(二) 研究方法

在數位典藏之技術方法與資訊系統開發方面：本計畫結合國立交通大學在資訊工程領域方面人才，嘗試以「開放／自由軟體」來開發出：不受商業軟體使用限制、使用者資訊能力進入門檻低、具備網路內容管理功能，且能與「數位典藏國家計畫聯合目錄」整合的資料庫系統，以豐富客家族群之傳播與文史資料來源、喚起客家族群意識與社會資源關注、提高社區／社群投入資料建置的參與度，讓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研究資料的典藏能在數位化架構下，跨校、跨區整合，豐富累積。

在推動客家文化學院青年學子參與客家社區數位傳播發展方面：本計畫就地緣關係取位於交通大學後，且近年進行社區營造已頗具成果規模的客家社區「金山面」，包括：金山里、科園里、關東里所在之各文史工作室、社區發展協會、國中小學、社區大學等為學生採訪對象。並結合學院必修如：「傳播基礎寫作」、「深度專題報導」、「田野調查」、「攝影理論實務」與「電視新聞報導」等課程，將研究計畫與傳播媒體教學充分整合。

此作法：一方面以「實作」來深化大專青年學子對於客家文化研究和相關公共議題的關注、興趣及參與，充分接觸在地客家族群，並進行採訪及數位化宣導；另一方面則扶助地區性民間文史研究單位及社區團體，將在地的客家文史資料與族群傳播議題資料數位化，讓客家團體獲得更多社會關注與資源，也為日後

全面推廣「數位傳播下的客家文化典藏」願景奠定基礎並累積工作經驗。

(三) 理論架構

歷史文化研究與資訊系統和傳播科技的結合，在過去十年來是學術研究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文獻資料朝數位化方向累積發展的必然結果。尤其自 1990 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紛紛將「數位化」視為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政策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挹注大批人力、資源、經費在圖書館和博物館典藏及檔案史料的數位化工作(謝瀛春；謝清俊，2001)。

在這場「數位化競賽」裡，台灣並沒有缺席。不論是 1990 年代初的「數位博物館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與「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或是其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又或是「挑戰 2008 兩兆雙星」的「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計畫」，台灣的產官學界同樣投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在資料數位化的基礎工作上。

不過，當大多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建置均須仰賴公部門投注大量與持續資源始得以執行時，這種運作方式似乎隱藏著兩個可預見，且有發展上邏輯依存關係的問題：其一，是否一旦停止經費挹注，大部分數位典藏計畫資料庫的生命也同告終止？其二，當典藏素材的選取與詮釋多數是「由上而下」，經過類似於傳統主流新聞媒體的菁英式編輯與價值判斷篩選的過程而產出時，是否會因此卻喪失吸納不同資料來源的機會及包容多元意見的能力？也因而斬傷數位典藏資料庫在單一計畫結束後仍能永續發展的生命力？

所幸，隨資訊與傳播科技(ICT)的快速發展，新的技術同時也展開了新的可能，從 BBS 到線上論壇，從個人網誌／相簿到「部落格」(Blog)，再進一步延伸到網路虛擬社群的連結，我們親眼目睹民間部門在共同參與資訊傳播活動上展現的蓬勃生命力。資訊傳播相關研究學者先後嘗試以「草根報導」(Grassroots Reporting)、「個人媒體」(Personal Media)、「部落格新聞」(Blogging Journalism)、「部落客記者」(Blogger Journalist)等名詞來描述這些現象，最後目前較獲一致認可的則是用「參與式傳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概念來指稱：一般大眾得以在網路技術的協助下更主動地參與資訊傳播的活動(蔡雯，2005)。

而由此一「參與」的概念出發，若是能讓更多與某一特定數位典藏主題「利益相關」或「興趣相關」的大眾共同參與該資料庫的建置及發展工作，似乎正可

為前述數位典藏的發展難題覓得一個可能的解決之道。

此外，當開發「參與式媒體資料庫」的構想被放置於「族群傳播」這個主題框架下討論時更格外有其珍貴價值，尤其是在回應前述有關典藏素材選取與詮釋的方法及過程問題方面。「參與式」機制看來似乎較有機會能突破目前典藏資料蒐集詮釋「由上而下」的侷限，讓典藏媒體資料能如國內學者所期待（一）大膽挑戰主流價值觀，具備反主流媒介論述特質，打破漢人或主流社會思考的迷思（謝偉姝，1996）；（二）建立歷史主體性的地位，以促進自我文化傳承，並建立年輕人的族群認同（孫秀蕙，1996）。

在族群與種族結構複雜的歐洲與美洲大陸地區，為解決境內「多族群」與「多文化」的保存與永續發展的問題，資訊數位化工作一直是重要的發展與研究方向。各先進國家在過去十餘年來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族群傳播與文史典藏資料及研究成果。

不過，回顧相關數位化計畫的發展經驗，學者卻發現：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快速進步，對文化研究工作發展、擴大族群參與，以及數位典藏資料的累積卻造成兩項非預期的顯著困擾。其一，主要來自「（參與）工作者對相關資訊能力的進入門檻障礙與技術掌握程度問題」；其二，則發生在「資訊系統建置的延續性與系統維護的受限性問題」（Wu & Liu, 2001）。

德國學者 Frommholz 等在一項對德國政府教育與研究部(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資助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數位內容發展計畫進行調查的研究中即發現 (Frommholz etc., 2003)：大多數執行數位典藏計畫單位為求典藏系統功能的完整與強大，往往開發出極為複雜以及令使用者難以輕易上手的資訊系統。同時，研究結論亦指出：「工作者對相關資訊能力的進入門檻障礙與技術掌握程度問題」不僅造成已受過相關訓練學術研究人員工作上的困擾，更造成其他外部資料貢獻者，如（地方）文史工作者與民眾參與的障礙，降低了數位化資料累積的速度與豐富可能性。

至於有關「資訊系統建置的延續性與系統維護的受限性問題」則普遍地反映在世界各國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實作 (Frowell, 2002)。典藏單位往花費掉大筆經費委請外部廠商建置資訊系統、協助數位化掃描建檔。但數位化工作大多隨計畫終止、經費耗盡即宣告結束，更遑論日後是否仍有能力對所開發的資料庫進行維護與系統升級的工作？

針對以上所論及，數位典藏計畫之「系統開發」與「推動需求」似乎在實務執行與發展邏輯上似有矛盾的狀況，國內學者謝瀛春與謝清俊即指出：「把內

容數位化之過程，不只是把紙面、刻版、器皿等媒介性質的內容數位化，還須因新媒介（網路）之特性，而賦予匯集、鏈結後知識再現之新意義。於此過程中，內容專精者要了解數位化技術之特性、限制，學習了解數位化之意義。而數位化專長者亦將因長期浸淫在內容專精者領域，而成為數位化內容的知識再現專家，不再只是一個數位化的工程師。」(謝瀛春；謝清俊，2001)

謝瀛春與謝清俊的觀點融合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理念，指出數位典藏計畫與數位化工作本身正是整合多元意見，並將文化與社會研究向下紮根，且達到教育和推廣功能的過程。這與歐美學者近來在數位圖書館及數位典藏之系統設計與內容發展方向的研究結果正相互印證，也是本計畫發展的理論基礎和發展理念。

(四) 重要成果

本計畫上半年先進行基礎資訊建設之整備與數位典藏資訊系統之開發。經系統測試與使用者訪談意見回饋後，歸納出以下三點「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料庫」的重要結論：

1. 應以自動化機制降低資訊能力進入障礙，豐富典藏資料來源。
2. 應整合多媒體自動化機制以豐富文化網站介面並增加可親性。
3. 必須以守門人方式進行資料庫審核工作流程與外部資料資源連結充分整合，以提昇文史研究資料的正確性與專業度。

後半年則由計畫主持人領導，組織客家文化學院學生團隊對「金山面」進行探索式之「深度新聞採訪報導」。採訪核心概念為：曾歷經保護老樹、高鐵事件、焚化爐事件的新竹金山面客家聚落，在激情的「風空主義」社區運動過後，隨著外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當地居民如今的生活面貌為何？客家聚落傳統、語言及文化保存和延續又如何？（金山面的老樹與伯公）？社區凝聚參與共同議題的向心力（科學園區焚化爐事件）？歷史傳承與現代化兩者之間矛盾對社區居民所產生的衝撞（「金山面」／「新科」國中命名事件簿）？最後進而思考社區營造理念與實際社會生活的辯證關係，探討對於一個有其歷史傳承，但卻有著各式各樣「新」、「舊」居民（第 N 代居民、園區、外籍、學生、商家等等）的客家聚落而言，到底什麼才是未來的「理想家園」？主題詳列如下：

1. 影音專題：「又見金山面」：金山寺・老樹與伯公・園區與高鐵・社區營造心
2. 深度報導：金山面的老樹與伯公 — 從「風空主義」看文化的延續

3. 深度報導：新竹科學園區與社區 — 親愛的，焚化爐 讓我們靠得更緊了
4. 深度報導：社區學校，學校社區 — 「新科國中」命名事件簿
5. 深度報導：理想家園 (A Perfect Place) — 社區 總體 營造 空間 居民 理想

（五）研究結論

本計畫在傳播研究領域首次嘗試整合客家社區發展議題及學院媒體教學實務，充分達到結合地方並推動青年學子參與社區數位傳播發展的研究目的。訪問包括：公部門、地方文史工作室與社區協會團體、學界，以及當地居民和地方相關人士，計四十餘人。本計畫成功引起金山面客家文史工作者和團體對社區數位傳播發展的關切和重視，總共完成三十分鐘金山面社區紀錄片乙部，整理後新聞照片（含圖說）共三百張，以及四份各一萬餘字之深度報導（合計共約五萬字）。成果除收於「客家族群傳播與文史資料庫」共計 1680 筆資料可供社會大眾檢索外，更為達到推廣客家文化目的，已建立起具豐富內容之「專題報導」網站，利用網路動態影音技術，讓研究成果更具可看性、可親性，提升外界對於當代客家社區與文化發展的興趣和關注。

日治初期專賣制度前後客家地區的樟腦業

黃紹恆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1、研究目的

台灣的樟腦生產起源甚早，不過整個產業有較明顯的發展，應該要等到 1860 年代台灣門戶開放之後，此時台灣的樟腦生產，眾所皆知，與台灣的客家族群有著密切的關係。日治時代的台灣樟腦業雖然於 1899 年成為台灣總督府專賣事業的項目之一，然而內山的粗製樟腦卻仍由民間自行生產，因此，從清代開始的樟腦生產型態，可以想見在進入日治時代後仍有其延續的一面。

台灣樟腦的生產由於為資源掠奪式的開採方式¹，日治初期已經深入內山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因此樟腦的生產基本上可說，所謂的「蕃害」成為其無可避免的副產物。然而，圍繞在樟腦生產的「漢蕃」關係，卻未必都是如此劍拔弩張的緊張對立，以支付「山工銀」之類的代價，獲取樟樹所在地原住民族的許可以製造樟腦，亦屬常見之作法。

若以族群的觀點來看待台灣樟腦的產銷過程，從產地腦寮、腦棧的原住民族、客家人、福佬人，到樟腦製品集散地大稻埕的洋行、樟腦行之福佬人及外國人，可說幾乎將台灣所有的族群皆牽扯在內。因此，台灣樟腦的生產及整個產業的發展，不言自明，亦可說其實就是各族群間互動、衝突、合作的結果。1895 年 6 月以降，日本開始殖民統治台灣，隨著台灣總督府所代表的日本國家權力在台成立，日本人開始深入台灣內山尋求製造樟腦的利益，使得台灣樟腦的生產結構變得更為複雜。

台灣總督府於 1899 年施行台灣樟腦專賣制度，對原本屬於民間自由發展的經濟活動，強加以國家權力的約束並成為其利益所在，其對該產業以及相關地區的人事物自然給予極大的影響。本研究基以日治初期 1899 年台灣專賣制度建立前後時期的台灣北部客家地區為主要考察對象。

2、研究方法

就自研究方法而言，在進入專賣制度所帶來各種影響的具體檢討之前，勢必

¹ *Maritime Custom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 :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9.*

類似的報導亦可在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發現，「本島的樟樹未必全部可製樟腦，在外表的判別上極為困難，因此不能像日本依照樟樹的數目進行交易。目前製腦人只使用樹幹下部十尺左右的部分，其餘皆丟棄。而且樟腦含量最多的季節為冬季，樹齡若未到達四十至五十年無法充分結晶，然而實際上採伐小樹至腦的情形不少。在樟樹漸少的地區，其根株亦被用來製腦」(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台灣產業調查錄』(1896 年 3 月)152-153 頁)。

對專賣制度成立前後的內山製腦地的實際狀況，必須先給予較全面性的理解，以爲前述考察的積盤。本研究經由梳理包括『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理蕃志稿』、『台灣蕃政志』等相關史料及資料，試圖描繪出日治初期台灣北部製腦業與客家人的關係，並以此對專賣前後台灣北部內山製腦現場的實況有所理解。

3、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基於上述說明，從清末到日治初期台灣的樟腦生產，由於與原住民族有密切關係，因此本研究從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及相關機構之形成、變革及執行開始檢討。其次，又由於本研究主題係鎖定在客家人，因此特別就原住民族、客家人、福佬人、日本人所構成的族群（民族）關係，作爲論述的另一個基軸。

4、重要發現

4-1 「殖產興業」方針下的「理蕃」

1896 年 8 月 15 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對軍務人員的訓示當中，表明「欲拓殖本島必先馴服生蕃，而今正際會其時機。若使生蕃視本邦人猶如中國人（的仇恨態度：引用者）一般的話，則本島之拓殖必將蒙上極大的障礙」²，可說日本統治者自始便是從經濟利益的觀點，構思其對原住民族之統治政策。

負責民政統治政策的民政局長水野遵則在「台灣行政一斑」作了更詳細的解釋，所謂「教化蕃民爲我政府之責務，開發蕃地爲培養我富源的要務。蕃人不通事理，迂於世事，固不待言。其雖從事耕作亦常跋涉山野以狩獵爲業，習於殺戮。自來中國人及其他人欲進入蕃地採伐樟樹，開墾林野，與蕃人之紛議常無絕期…樟腦製造、山林經營、林野開墾、農產增殖、內地人移住、礦山開發，無一不與蕃地無關，台灣將來之事業實在蕃地。因此要在蕃地興起事業，必先使蕃民服從我政府，使之獲得生活之途，必須使其脫離野蠻之境遇」³，由此可知樟腦的製造又爲台灣總督府開發「蕃地」的首要目標。至於「理蕃政策」的制定，儘管台灣總督府批評清代撫墾局官員的貪婪誤事，不過在對清代的原住民政策作了詳細的調查之後，可說完全繼承清代的政策與建置。

1896 年 6 月各地撫墾署著手設立之際，民政局殖產部對各署長下達訓令，指示現有樟腦製造的處理要領，暫時嚴格禁止一般日本人任意進入山地。不過，1896 年 9 月台灣總督府基於其「殖產興業」政策的必要，實在也無法再嚴格禁止平地人的進入內山，於是發布府令第 30 號允許獲得撫墾署長許可者進入山地從事商業活動⁴。與此約略同時，台灣總督府對霧峰林家(林紹堂)所屬隘勇給予每月 2000 圓的補助。日本統治者原本對台灣各地在性質上多少屬於民間私有武力的隘勇之類的組織極爲忌避，其主要原因當然在於日本人尚無法分辨台灣人對其統治的接受態度。霧峰林家隘勇的接受補助，實則開啓日治時代的隘勇制度之先河，其實

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誌稿』第 1 卷（1918 年 3 月）2 頁。

³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蹟提要』第 1 卷

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誌稿』第 1 卷（1918 年 3 月）28 頁。

又與樟腦的製造有密切關係，台灣總督府出於樟腦利益而施行原住民政策的基本態度，由此可清楚看出。

總的來說，台灣總督府施政對內山樟腦製造明顯的促進效果，大概是從 1897 年 6 月民政局殖產部長為提高 1896 年 10 月所發布「台灣官有森林原野產物賣渡規則」（府令第 44 號）及「台灣官有森林原野貸渡規則」（府令第 47 號）等法令的績效，對各撫墾署長發布「在山林的經營上，對製腦業及伐木的管理，自始即有其必要，森林原野產物賣渡規則既然已經制定完成，自本年度就有各種收入預算的命令，因此製腦所必需之用材、薪炭用之木材固不待言，其他諸如建築用材，在不妨礙撫蕃的範圍內，應對民間出售」之命令，各地撫墾署於是以此鼓勵平地人進入山區興辦事業，才明顯地出現，不言自明，樟腦生產亦因此有更加的发展⁵。台灣的製腦技術也由於日本業者的參與，摻入日本系統而形成有別於清代台灣的新技術內容。不過，在漢人及日本人積極入山製腦的同時，所謂的「蕃害」的問題亦無可避免地更見發生。

4-2 台灣北部客家區的製腦狀況

內山樟腦產地有腦棧及腦寮的存在，腦棧為大稻埕或廈門洋行或商店的代理或分店，負責從腦寮收購粗製樟腦轉運離台。腦寮則為製造樟腦的單位，有腦長主持腦寮事務，其下有腦丁實際入山伐木製腦。腦棧與腦寮的資金關係依腦寮的資金力量或來源，可區分成 3 種情形，即腦棧支付經費給腦寮，腦寮必須開鑿道路搭建腦寮，所製樟腦全部歸腦棧；其次為腦棧貸款給腦寮，後者每月運送若干樟腦給前者，以償付貸款；其三則是自由買賣。至於腦寮是否以資金提供方式控制腦寮，僅從上述資金關係未必可清楚看出。不過，日治初期內山的腦寮在資金方面大都依賴外國人（台北 3 名、台南 3~4 名），或福佬人⁶，

1896 年，新竹街有樟腦商利源號（店主鄭捷南）、東順號（陳志誠）、恒泰號（陳辰齊）、聯成號、致和號、茂泰號、錦泉號等 7 家。北埔則有聯成棧、義利號、泉源號、義益號，茅埔則有東順號分店。南庄則有樟腦商聯成號（溫勝）、良德洋行、邱交、莊華、曾松秀、莊降生。獅里興社有聯成號、林公館、李振輝。大湖地區有聯成號，魯麟洋行、葉逢春、詹廣隆、詹阿定、詹石頭、葉老番、陳澄波、劉振隆、朱啓榮、張阿進、格成號、吳慶鼎、吳永康。南湖地區有魯麟行、黃南球、聯成號。桂竹林有劉宏才⁷。

至於腦長（或腦戶）與腦丁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並非想像中的勞資僱傭關係，反而比較像是「承包」的債務關係，而且這種關係經常是跨越腦寮之長的腦長，而是出資者與勞動提供者之間的直接買賣關係，這類承包的關係似乎為台灣漢人社會常見的經濟活動型態。在王學新的研究亦提到腦丁自行製腦，除支付「防

⁵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誌稿』第 1 卷（1918 年 3 月）55-56 頁。

⁶ 伊能嘉矩『台灣蕃政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年 3 月）147-149 頁。

⁷ 「八戶道雄外一名新竹支廳及苗栗出張所管內林務調查復命書」（『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506 冊，轉引自王學新編譯『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 年 12 月，1735 頁）。

蓄」費用外，亦必須向墾戶支付每灶 2、30 錢的樟樹費。南庄地區則可見到攜帶刀槍投靠腦長，向腦長或樟腦商人支借資金承包製腦。還有些無所屬的腦丁侵入內山，從事開墾及製腦，惟此方式類似一般貧民營生作法⁸。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紀錄客籍製腦者，新竹方面計有 1896 年 8 月申請製腦的和興庄馮文廣、大湖大寮村吳定連、八角林分水庄黃榮遠、新開庄詹其石等 2 名、南湖黃運添、桂竹林庄劉宏才、老雞隆村吳阿義、三叉河內草湖村吳樹福、苗栗街黃經文。1897 年上坪地區製腦者有馮華卿的扇仔排腦寮、金復成的吊兵樹腳腦寮、吳章的十八兒社腦寮，油羅地區有劉家水(劉榮芳)的橫屏背腦寮，馬武督方面有周源寶腦寮。1900 年馬以哇來社一百灶方面有溫連勝腦寮，新西熬有徐泰新腦寮。苗栗方面於 1896 年 8 月計有和興庄馮文廣、廣泰成代理人黃細苟、新開庄詹其石等二名申請製腦。同年，馮文廣次子馮阿丁進入下撈社製腦。1897 年廣泰成與馬那邦、司馬限兩社交涉製腦，後黃細苟又將其中大窩製腦權讓給陳瑞昌及林政文，後兩者因而合組「本成公司」。黃南球長子黃運添則往汶水河以北大東勢發展，1899 年 9 月運添歿，其子黃逢森繼承。1900 年 5 月桂竹林劉緝光(宏才)於汶水河岸製腦，葉仕添於大南勢社製腦，1901 年 4 月吳永康至馬那邦山製腦⁹。

就台灣北部製腦地區漢人族群的分佈情形而言，大料坎正可成為客閩交界點，其北的屈尺、三角湧以福佬人為主，其南至東勢角則以客家人為主，大料坎本地客閩各半。日治初期日本人到此地作實地調查時，仍觀察到大料坎地區的客閩族群之間仍有「軋轢之傾向」，至於對客家人的觀感則是性情頑強堅忍，壓制泰雅族之凶暴，內山開發實賴客家人之力云云¹⁰。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東勢地區的隘丁以漳泉移民的福佬人居多，幾無客家人，多為無妻者。

不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日本的製腦業者及技術亦開始流入內山的製腦地區，成為客閩之外，另一個新的族群(民族)。

1896 年日商柏井商會積極交涉製腦。同年 12 月「合番頭目」日阿拐取得製腦權後，與富士商會、奈須義質訂約，在石壁下製腦。日阿拐將獲准的 1380 粒鍋的製腦權讓出 551 粒給樋口達次郎、藤田傳三郎、住友吉左衛門，樋口於是在大湍山、水尾坑設灶，雇用日本腦丁 7、80 人。1897 年初，和興庄馮文廣將其在八卦力製腦權轉讓給佐藤里治，佐藤所設置之腦寮由小牧昌平負責，有 20 餘名腦丁及職工，日式腦灶 30 個。同年 10 月五指山撫墾署報告「新竹縣樹杞林轄內居住北埔之內地人力安作一、森永隆三與製腦認可人彭進長締結合約，欲於西熬番社內製腦…力安作一先前為長坪化番豆流明之製腦代理人，於本署轄內長坪、一百端山、深壠等地從事製腦，先前各地腦寮皆遭番人襲擊，唯有力安腦寮絲毫無損，此乃其基於與番人訂定之契約而自行履踐義務，故與番人關係良好所

⁸ 王學新「日治初期竹苗地區樟腦事業的殖民化」(王學新編譯『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 年 12 月，1734 頁)。

⁹ 王學新編譯『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 年 12 月，1736-1738 頁。

¹⁰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台灣蕃人事情』(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 年 3 月)160-161 頁。

致…馬武督方面，台北六館街上村富一雖已獲得製腦權，但目前開始製腦稍有困難，故首先於油羅方面由官方售予木材，以從事製腦」¹¹。上床仲之進、松本徒爾則於獅頭山附近製腦，因原住民族襲擊被迫終止製腦。力安作一腦寮後來亦遭受「蕃害」，其本人則於 1898 年 5 月遭到戕害。「合番頭目」樟阿斗將製腦許可地委託奈須義質經營，同樣為「合番頭目」夏矮底則委託給森永隆三。「合番頭目」豆流明在南庄的製腦權委託杉林小一郎。1898 年 9 月位於苗栗街的台灣興業合資會社神尾敬吉傾全力在大窩、社寮角建築新腦寮，並意圖往大馬那邦山推進。同年在東勢角已有「台阪合同公司」運用「土佐式」腦灶製腦¹²。該公司係由大阪商人藤田傳三郎、住友吉左衛門以 38 萬圓加上霧峰林家林紹堂提供名下樟樹林組織而成¹³。此外，江商合資會社小川真一接受「合番頭目」絲大尾於苗栗小東河附近的製腦權，建造日式腦灶 70 座，雇用日本腦丁百餘名。1900 年內灣方面有平井雄介前往油羅、加那排社製腦。同年 3 月，白石元二郎往馬那邦及八卦力發展。同年，松田時馬於南庄地區製腦¹⁴。

最根本的族群問題還是原住民族與漢人之間的衝突。

日治初期的台灣內山，由於統治者的更替帶來新舊統制機構未能立即銜接的權力中空，使得整個情勢變得非常複雜而且不穩定，此時原住民族殺傷漢人的「蕃害」頻繁發生，可說是最直接的說明。不過，由台灣總督府各撫墾署的報告內容可知，其造成原因甚多，並非由於任何單一族群所致。

在台灣總督府的統治力量尚未完全控制內山的情況下，製腦地區的動亂與不穩。簡要地說，由於清代在各樟腦產地的軍事力量(包括隘勇)撤退，使得當地漢人聚落立即暴露在原住民族的武力威脅之下。後者基於許多原因，譬如恢復祖先所遺留之地、每年秋季戕害的慣習，在無制衡力量的情況下，頻仍出草殺人。不過，更值得留意的原因則為漢人及日本人亦趁公權力尚不足控制各地治安的情況下，私自進入山區濫伐密製樟腦，引起原住民族的不滿。

5、結語

1899 年台灣總督府施行台灣樟腦專賣制度之時，其公權力僅落實於銷售而未及內山的生產。或許主政者自始就未曾想過欲將生產納入國家權力控制的範疇，然而由前節的說明亦可了解到，即使台灣總督府有主觀的意願，然而內山錯綜複雜，多變而不穩定的局勢，並非其能力所能掌控之處。樟腦的專賣既然出於財政收入的考量，在內山不靖的情況下，勢必將付出更多的代價，最終有可能使台灣總督府無法從樟腦專賣獲得其預期之目的，因而在製腦方面聽任民間自辦，

¹¹ 「明治三十年十月份五指山撫墾署事務成績報告」(王學新編譯『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 年 12 月，160-170 頁)。

¹² 村山正隆「台中縣東勢角地方製腦業」(台灣總督府『殖產報文』1896 年，180-184 頁)。

¹³ 「本島ニ於ケル會社ニ關スル事項取調ノ件」(『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7(明治 32)年永久保存追加 8 卷)。

¹⁴ 王學新編譯『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 年 12 月，1739-1742 頁。

亦屬不難想像之處。也因此地方上的台灣人(客家人)豪強或資本勢力未因專賣制度的施行而立即衰退。相反地，如北埔姜家、苗栗黃(南球)家可說以此爲其基礎，隨著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及經濟活動的多樣化，將所積累的資金轉投資其他不同的事業，更進一步擴大其家族財產的規模。

關鍵字：樟腦、客家、蕃害

紀錄影像中的客家族群

林文玲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1、 研究目的

隨著 1990 年代台灣興起的紀錄片風潮，以及多元族群文化意識在社會中抬頭，近年來關於客家族群的影像紀錄逐漸形成。2003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舉辦第一屆「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在清楚標示「為塑造客家新形象，凝聚客家文化意識」的目標之下，推動紀錄片的製作與實作的課程。培訓計畫共有 29 位學員，歷經 6 個月的課程訓練，完成了各自的結業作品。這些影片後來經過一番修整，總共推出 26 部作品，其中 14 部影片並於 2005 年「客觀系列紀錄片影展」巡迴各地，隨後也取得在客家電視台播放的機會。

本研究循著「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中「為塑造客家新形象，凝聚客家文化意識」的目的，從族群影像製作及其過程作所涵蓋的文化事件（包括文化形象、認同塑造與文化想像、文化復振各層次）與社會過程（社會網絡、社會連帶與社會動員等）兩個面向，觀察並討論此項目標如何達成與執行的實際狀況。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理路從文化迴路 (the circuit of culture) 相互環節的概念出發，觀察客家族群形象及其意義，如何在不同的場域中被製造出來，並透過不同的程序與實際的操演，循環流轉而成客家族群文化及其「文化的迴路」。計畫實行從影片過程的三個相關連的環節進行：製作者 (producer)，生產 (production) 與產品 (product) 三個連續過程，探討客家紀錄影像在何種時空脈絡，以及在甚麼樣機構性因素與生產的條件之下，進行影片拍攝。

「製作者」與「生產」的概念在此不僅僅是影片工作者個人，也包括影片製作得以開始、成形與完成之所有環節中的機構、資源以及意見、看法的協商及其機制。本研究也針對客家影像的社會影響進行初步探討，關注這些影像紀錄作品經由什麼樣的管道播放、進行映演活動，並與觀眾產生互動。

3、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針對近年來出現的客家紀錄影像進行探討，影片本身、影片得以出現的社會文化脈絡，以及影片的意義、意涵與社會效應都是研究與觀察的重點。因應這些議題現象，本研究以影片出現的脈絡、影片過程以及（影片作為一種）文本三條軸線及其彼此間的互動作為描述的重點與問題分析之架構。

一、視覺「顯影」的文化知識／想像

文化本身不是有形可見到的，只有經再現程序，文化才得以現形顯露而被看到。文化只能經其所屬成員，透過行動及文字表達（或建構）出來，而且不是就這樣丟給一個影片導演，而是必須經由他與參與影片製作的成員加以錄影、錄音、剪輯、修飾與詮釋。文化本身並非一見即明的，只能透過「再現」（再現的過程與再現成品）才可被看見。

1、廣義的作者身份探討

在此需對「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的構想與規劃進行瞭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自 92 年 6 月 16 日起至 93 年 11 月 21 日期間，以 5 個多月時間透過民視承辦「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此計劃目標為培養客家影像製作人才，鼓勵從事客家影像之專業製作，以影像紀錄社區發展、族群關係及文化遺產等議題，並促進客家地區文化的發展與保存。

培訓內容與課程安排由虞戡平與彭啓原兩位導演共同策劃。其中彭啓原導演對於如何注入客家議題於紀錄影片中尤其有影響力。由於彭導演具有客家族裔與影像工作者雙重身份，這樣的組合加上彭導演本身對客家議題與客家社區進行長期田野工作與影像文化報導，如此之背景對學員以及結業影片的選題、拍攝與呈現有其關鍵影響。

2、導演與影片形成

從訓練課程的導演養成與所創造的互動機制，瞭解影像製作之前的文化／想像，外顯或隱然的社會、文化事物，為何與如何成為影片主體。哪些事物被選取、標示，以代表族群的傳統、智慧、文化與生活方式，其特別不同於其他族群、文化的特徵，並且具有現代譬如環境意識、社會意義的事物。

3、影片題材與主題

「客觀」系列紀錄片由 2003 年「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結訓學員的 26 部影片組成。這些作品被分在「文化・生活」、「社區・故事」、「人生・夢想」、「女性・生命」四個主題範疇之中。2005 年「客觀影展」所巡演的影片，是從 2003 的作品中挑出一些影片，透過彭啓原導演的協助，並在客委會的支持與經費贊助之下，以大概一年的時間將原來 20 多分鐘的影片交由另一位充當「後製導演」的學員，持續發展影片議題、拍攝並完成適合電視播映長約 48 分鐘的影片。

從「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及其結業作品，瞭解作者身份（包括廣義與狹義）是在既定的機構因素及其推動的社會文化活動中，具體落實。

二、影片攝製「牽動」的社會過程

客家紀錄影像需面對的不只是長久以來因族群互動被抑制的族群聲音，還要處理代間差異以及「在地」與「全球化」的碰撞與交涉之下所浮現的「轉化中的文化身份」這個議題。「轉化」同時包含變化與型塑，也都要面對既存的（刻板化）「形象」與「文化再現」，作出回應。攝影機器的注入，所引發的社會關係及其互動與參與者觀點的交涉與協商，透顯的是代與代之間文化知識、歷史記憶、認同諸多斷裂的一種縫合的努力。

客家紀錄影像製作由於常植基於當地的人、事、物以及社會關係、網絡所生發的影片拍攝活動，其所關切的是文化、族群與其賦與人們之意義。它關切的雖然是當下的生活實情，但也因為其汲取養分自傳統、族群文化與自己的由來處，所以其實也是對文化／想像的（未來）記憶，所以是再製作一種針對未來的記憶，這其實就是文化再生產。

三、攝影機「翻譯」的文化

經由攝影機介入，觸發的有關意義「轉換」的議題，基本上包括了語言、文化以及影像化過程所牽涉的翻譯或轉化的問題。我們「觀看」這個世界的方式，受到文化傳統的制約，同時我們也是透過這個方式，將我們接收到的影像賦予某個概念。而文化或傳統並非靜止不動的，它會發展、會有變動，生活其中的人對自身文化與其感受、領會，會因時代或地域性而不同。

影片的攝製明顯化兩種「意義」之間的轉化：一是族群內，代與代之間關於傳統、族群、文化與集體知識的傳授與交換，這之間「語言」顯然居主要的中介地位。語言不只傳遞文化意義，也召喚著族群的情感生命。另一層次的轉化在於攝影機如何將關於族群的概念、思維、行為或情感具體成形地表達出來。

四、映演系統與社會影響

「客家紀錄影片」目前的情況大多是低成本、非商業取向、非娛樂用途，面對的也非一種全球化的大場域，所以其存在與發展反而凸顯影片作為書寫、銘刻與再現——影片作為表意實踐——族群文化的特徵與真實用途。而表意行為的產生是在既定的社會情境中進行，如何展開、影片在什麼地方放映、如何被觀看閱讀、可以被置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下理解，不同的映演管道或場合可能引發的不同意義效應，都企圖說明，影片作為一種媒體有其非常社會性的面向。

2005 客觀系列紀錄片影展活動，透過巡迴影展與電視播映的方式，已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文化與社區的生命力，以及客家影像的多元呈現。也在影片影片之展演活動中，注入文化主位者的觀看視角，解放在社會上流傳關於「客家」的刻板、標籤化的認知。

4、 重要發現

「客觀」系列紀錄片的影片對象（人、事、物）多數來自鄉村或聚落，在放映地點的規劃亦著重地方觀眾的經營。這樣的現象說明了「客家」族群及其辨識依舊立足在目前既定的地域分佈上。

呈現客庄在地人，透過影像一層一層的覆蓋，將產生客家人典型的加強效果。但，同時凸顯的則是族群與文化之邊界與城鄉分佈的某種對應性，以及隱含的社會階層分化的現象。

客觀系列紀錄片影展企圖經由紀錄片的放映創造意識與意義激盪的空間，一方面測試這批紀錄影像能夠釋出的力道；進一步藉由與當地相關的影片放映，引起注意、激發構想，結合在地的人力、資源與故事，延展客觀系列紀錄片所啟動的刻寫客家的影像穿透力量。甚至轉換被拍攝對象成為客家紀錄影像工作者。

5、 結論

「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一再強調這項影像方案是從視覺媒介的角度，推動關於族群文化的事務。在此，影片製作所針對的族群議題讓影片拍攝成為一項文化事件，而這項文化事件與文化及其認同息息相關。「客家影像製作人才培訓計畫」學員的結業成果影片從文化的局內、局外來看，影片的所有過程一方面在探索身為客家族群的各個面向；再一方面也藉由影像的傳播一再描繪、鞏固客家（有別於其他族群的）種種形象。

客家紀錄影片從上述角度而言，其溝通的意向既對外也對內，至少需面對兩種類型的觀眾（對象）：一是不同文化的社會團體，另一是自身社會中不同世代之間的文化成員。影片如此的媒體特性，非常類似 Faye Ginsburg 所指陳的當代民族誌電影所具備文化仲介的功能。因而，少數族裔的影片（包括台灣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與民族誌影片有其相似之處，這些影片常被視為是一種文化媒體（cultural media），都為了傳遞文化（mediating culture）而使用電影與錄影媒體技術，倡導與傳播關於某一族群文化的知識。

關鍵字：客家族群、影像再現、文化身份、文化中介

界線、認同和忠實性：

進香，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

林秀幸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研究目的

「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辯證幾乎橫據了這個時代的學術心靈，前者指涉於城市化、經濟與生產、市場化、大眾媒體的播散、流動性、交通的無遠弗屆，語言、家庭結構、政治、教育機構，經濟過程、休閒型態的相似性；後者指涉當代大量湧現的社群意識，不管是以族群或地方等等為名，不管是對「傳統」的重新擁抱或地方語言權力的政治要求。這兩股力量的並存或拉扯或互相給予形式，我們可以 Cohen 在 1989 年完成的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一書的目的作為一個參考點來開始本文的論述，照 Cohen 的說法：正因為當代社群的地理界線（boundary）被弱化，所以對於社群界線的象徵性表達（symbolic expression）會被特別地強調。亦即當社群經歷快速和失衡的社會變遷過程，將引致某些本能的反應，這樣的反應經常是對社群整合以及對社群界線重構的意願和承諾。

這本書某種程度說明了當代的社群意識的高漲和隨之而來的社群重構運動，但是問題也接踵而至，界線重構之後呢？我們以何為重構後之社群文化的本質（substance），如果界線的重構只是對過於抽象的理性結構的反動，或說只滿足於和他者有所區別（distinction）的目的，那麼足球隊或任何其他圍繞商品標籤而建構的小群體（譬如某某品牌車隊）和族群或地方社群有何差異？「認同」是什麼？是一個或多個？如果「界線」和「認同」只是交易過程（transaction）「協商」（negotiate）的結果，「認同」這個概念是否可以有效地探測或說明人們對族群和地方社群所許下的「生命一般」的承諾？也就是「忠實性」（authentic）的問題。對小型社群的重構，能夠完全重拾「原先」的實質的社會生活感（most substantial experience of social life）嗎？這樣的實質的社會生活感的修辭可否轉譯為論述性的概念語彙？無論如何重構界線，還是要面臨與他者的關係，難道在巨

大的工業化力量來臨之前，社群不會經歷和他者相遇的經驗？它當時又是如何處理這個和他者的關係？如果文化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和他者協商的創造性過程，那麼當代的我們不滿意者為何？一種「整體感」或「歸屬感」？它是單一目標還是漸層的回歸？「界線」是否扮演一個決定性因子？

2、研究方法

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都要回歸到社會人類學上非常基本的議題來討論，這牽涉到整體和部分（whole and part）、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文化的形塑過程、個人性和集體性的分配性位置、社會結構和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s）、以及主觀理解他者的議題。

本文的目的即是要透過一個客家地方社群每年例行性地朝北港等地進香的旅程，來試圖對以上的問題作出可能的回應以及對現象的詮釋（interpretation）。在進入田野描述之前，容我們對交易、社會過程、界線、族群認同、象徵建構、社會尺度等議題歷時性的理論發展作一回顧，最主要的理論建構者當屬 Barth 和 Cohen，兩位學者在 1996 年的一次論壇裡重新檢討了他們自己當年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並在 2000 年出版了合集 *Signifying Identities*，很富啟發性。這個理論發展過程並沒有全然被否定的對象，每一次的理論陳述都對以上議題做出一定面向的貢獻，這個文獻回顧，試圖經由每一次的理論建構和修正，截長補短，企圖對我們陳述的問題提出可能的視角和取徑。

3、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一）「整合」還是「理解」

Barth 在完成膾炙人口的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y* 之前的一本小書 *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1966），似乎提出對文化形式和社會形式更為寬廣的視野，如今回顧仍然深具價值，細察 Barth 的論述，有幾點可以被進一步延伸：

1. 「經驗」的面向被引入文化形塑的過程，「創造性」存在於「跨越雙方」的某種模式的建立，由此建立文化的模式。文化形塑的動力即存在於雙方認知能力的互動上面，因此文化不見得就是一個跨越雙方的「原則」的確立，而比較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the process remain the process）。
2. 「整合」概念的有效性受到限制，這個涂爾幹學派（並非涂爾幹思想的全

部)奉為圭臬的概念，其實某種程度限制了人們對文化的想像，如果「整合」不是唯一目的或最高價值，那麼人們在追求什麼，似乎比較是一個「相互理解」(understanding)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並沒有所謂單一的規約可言。

3. 如果我們對照 Geertz 論及”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1974)對「理解」的觀點，我們會發現其間高度的可互相援引處，所謂永恆地來往於雙方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而可以進一步推演 Barth 對文化的觀點，比較趨向於理解他者，比較接近對諺語(proverb)、暗示(allusion)或詩的理解，透過類比、隱喻、象徵，達到類似於聖餐的共享(communion)。人類學家對他者的「理解」正類似於社會過程裡任何「自我」對「他者」的理解。
4. 雙方合意、互惠的交往模式，相當程度是人們期待的「合理」的溝通情境，在此我們可以對照哈伯瑪斯的「理想的言辭情境」的概念(黃瑞祺 1996: 181)，這樣的情境是一個期待值，但是有可能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所扭曲、壓迫，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衍，權力的變數對文化的形塑佔有很大的決定性。

(二) 生活經驗、認知模式，他者和自我的嵌合

Barth 爲了有責於當年所提出的概念，認為界線之間的連結或溝通，是建立在「過程」，而非由先入爲主的「界線」所界定和運作。他和 Maurice Bloch 相呼應，認為人類學的內涵有待「認知」理論的補充，人群生活是由社會互動所建構，而非僅是「認知的再現」(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透過互動，「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es)決定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一如認知模式決定社會過程的一樣多。認知的分類和生活經驗(cognitive categories and lives experience)的質性不同，前者明確，後者接近陰暗(murky)，人們如何「理解」(understanding)他者的世界，並非認知先行，而是使用大量的形象(images)、行動。

4、重要發現

1. 永恆的「我」裡的「他者」

(1) 當地人如何接納「他者」的態度，祂永遠是「我」裏面的「他」。被社群接納為自己的一部分之後，媽祖並未代替當地的主神，「流動」並未成為主體，

它成為那個「必要」的「部分」。祂不只是由外面流入，他們也將之向外流出，譬如竹東請來的媽祖，會再借到山邊的聚落。而大湖的媽祖也借到鄰近沒有廟的村落。這個「流動性」成為自身文化的一部份，甚至擴散到新的社會群體，來加強鄰近社群的溝通，成為此地社群新的文化元素。

(2) 文化既然不全然是一個跨越雙方的「原則」的確立，而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繼續保持這部分的流動性，也同時保持了向「他者」開放的一個「部分」，亦即將「流動性」成為「自我」的「一部份」，持續不斷地「理解」這個永恆的「我」裡的「他者」，一種持續地來往於雙方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2. 「社會我」的轉換：「質變」的隱喻，「跨越」的美學

從家裡把香旗（又稱令旗）迎來廟裡，必須點一支香向家裡的神明稟明要去過爐了，此時令旗代表了家裡的神明，這面旗「象徵」或「隱喻」了「家」的群體作為一個「整體」（whole），一個「我的整體」，這支香必須沿路伴隨令旗直到廟裡，「香」具有持續燃燒的能力，不會中途熄掉是其最大功效，它是持續的「連結者」，帶著這邊的「本質」（substance），連結到那邊的「本質」，經歷一種「質變」（transubstantiation）的過程（Firth 1973：420）——香變成灰，從這個「我」進入到那個「我」的質的轉換，「我」的認知的轉換伴隨著「社會我」的擴展。

3. 同理他者的「整體」，維護自我的「整體」

所有的變動，不管流入或流出，都必須經由敬奉「整體」的倫理或秩序之後，才能被納入或流出，這是維護這個「整體」的「完整性」或「界線」而做，或許這個「整體」之後可能變成「部分」，更因為如此，這個「整體化」的儀式除了維護「界線」，也是將其倫理烙印在成員的意識中，有兩重意義，其一，為了「反思」或「回程」時，成員必須重新啟動這個完整的「整體」，其二、任何的「變動」或面對「他者」，不能破壞原先的「我」的「完整性」，以致於這個不斷同理他者之後所形塑的「社會我」（persona）不是空洞或流動或混沌，它是一個漸增漸減的「完整的全然」的漸層圖，有如不斷擴增的四合院。

4. 「落媽」：更新的「理解」必須落回「自我」的格局

所有的聖物經由越過每一個爐的手續而連結了一次這個「整體」，經由香灰的分享，他們即將帶回這個「整體」的感知、經驗、象徵。香灰的轉換的屬性得以將這些經驗、認知與象徵轉換到大湖的社群經驗，因此，這個理解「他者」的過程，「回程」是絕不能省略的，必須將視點重新循線回到自身所在，回到自身的「整體」的倫理，旅程才算完成，這也是為何媽祖回廟時，儀禮甚至比離廟時更為隆重，並且還有一個特別的儀式名稱——「落媽」——媽祖落回自身的「整體」。

的美學格局裡。

5、結論

「界線」的概念可能必須以「整體」的倫理和美學格局來補充，它不僅涉及理性的面向（即「界線」之所在），還包含內部空間的、經驗的、感知的、生活的面向，以及化解理性和感性之衝突的共享的神會。何謂「認同」？是那個被界線包覆的「所在」，還是權力壓制之下產生的「區辯」意識？或許都是，然而「香」的持續的連結性和「質變」的特質，正印證了從這個「我」轉換到那個「我」的質變的隱喻，也說明了人們從這個整體進入到那個整體的潛能，因此「認同」的意涵似乎應該從「歸屬於什麼？」的問題轉換到「往返的旅途」的意象。¹⁵ 對此「社會過程」中每一個「整體」的認知，包括個人、家族、地方社群、族群，視其為「整體」的必要性，拒絕「簡化」的誘惑。然而「認同」因此可以無限擴增嗎？旅途中個人家庭、或地方社群曾經被象徵化為香旗、置香灰的木盒、神明等，然而對這些象徵物的認同都必須在回程時予以重新啟動，並返回到對真實的日常生活空間的認知，身體、空間和時間的實質結合，行動的倫理和美學，面對面的感知和生活經驗的「整體性」，它們都不能被化約為被意識把玩的「物件」，那麼「回程」和返還為實質生活的必要性都不可能允許我們在「想像」的層面無限擴增「認同物」，「經驗」的實質性牽涉時間的長流和身體感的綿密互動，然而「視野」的轉換只需眨動雙眼的視角形塑認知。除非我們寧可選擇「幻影」（Baudrillard 1981）的不斷更換，捨棄實質的生活感：面對面的合作、衝突、協調、抽離與再面對的勇氣和耐心 — 不斷拓深的「理解」。

既然每一個「整體」都在不斷地拓深、開展和更新，人們也可以從這個整體進入到那個整體，人們忠實於什麼，或許不是對「包覆的整體」的既定內容的認定，而是誠心誠意地進入每一個「整體」，尊重每一個「整體」，抵抗「簡化」與「踐踏」的誘惑，¹⁶忠實地完成每項儀式程序 — 對每一個「整體」作為「整體」的承認，以及對「他者」的理解必須「落回」到自身格局的承諾，對完成真正的「理解」 — 履行「回程」的堅持。在這個過程當中，有限的「整體」 — 族群、地方社群、家族到自我，它們不是目的，是完成旅程的過程中難以放棄的「過程」，而當代正充滿著「放棄」的誘惑，缺乏的正是「回程」的允諾。

關鍵詞：進香、界線、認同、理解、認知

Keywords: pilgrimage, boundary, identity, understanding, cognition

¹⁵ David McCrone 將多重認同的問題從「根」(root) 的意象轉變成「路」(routes)，然而我們認為兩者都有其意義，因此將之轉換成「往返的旅途」。

¹⁶ 「踐踏」的順序通常從最弱勢之處開始。

女性、婚姻與家族：北臺灣客家女性的口述歷史與分析

連瑞枝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 研究目的

客家婦女是誰，像是一個不需著墨的問題一般，她是阿婆、母親、姐妹、女兒，住在隔壁的伯母，或是蹲在市場一角兜售自己種的青菜的「人家」。如果我們仔細推敲、斟酌這些女性是誰，她們的身份如何定位時，會發現往往決定於談話時的關係脈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也就是她們是誰的女兒、後來成為誰的妻子、誰的母親，以及圍繞在這些關係中的故事與細節。本研究計劃的目的不在於說明客家婦女的特殊性，也無法視客家族群的文化性因素是決定客家婦女生命史的要素，而是希望藉由近幾年在學術界已經逐漸形成有關客家婦女的研究的幾個脈絡，透過北臺灣客家婦女口述訪談內容，也就是從一個非「他者」的角度來思考客家婦女在家戶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 研究方法

本篇文章以臺灣北部地區客家婦女為研究對象，採用口述訪談方法收集資料，希望藉由九位客家婦女的口述訪談記錄，達到以下兩個主要研究目的：一、鋪陳客家婦女如何訴說她們自己的生命史；二、透過對客家婦女在社會脈絡下所展現的家庭、婚姻、及勞動等關係的描繪，進行不同學科已對客家婦女的研究進行的對話，補充當代對客家婦女的理解。

這篇文章是建立在九個口述訪談的個案來進行分析，受訪者的年齡約在六十五歲至九十歲間，多居住在新竹地區。這九個個案的訪談雖未必對所有的客家婦女具有代表性，但是我們嘗試在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經濟背景下，有意識地挑選不同類型的對象進行訪。她們大多是出生於日治時期，在童年到結婚以

前，歷經了臺灣四、五十年代的貧困的經濟生活條件，為人母之時，適值六十、七十年代臺灣社會在經濟上逐步的穩定發展。

這個訪談計劃是以生命史為核心，談話的內容最主要以生活中的勞動與人際關係為主，也就是如何勞動、與家人相處、結婚、生育子女以及維持一個家庭的基本生活等等。所以，我們訪談的話題是以「妳小時候的家庭與生活」開始，內容則便會圍繞著受訪者的家庭以及父母來談起，童年、婚姻、生育、勞動以及老年生活為主。談話時，可見其多著重在人際關係的敘述，尤其女性歷史的細節為主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會談及許多她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的記憶，許多涉及受訪者母親的童年，其年代跨越幾近百年。文章的內容除了呈現其記憶內容以外，她們如何記憶自己的過去以及其思維方式，文章的主題之一。

三、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莊英章與武雅士(Arthur Wolf)於中國傳統社會婚姻模式的歧異性與多樣性提出了區域研究與比較的模式，他們的研究指出，居住在山區資源較為侷限的地區，小婚或是童養媳婚是有助於家戶之間的再生產關係的建立。¹⁷這與客家地區女性的婚姻模式相互吻合的。在大陸地區，客家女性的「童養媳」或是「等郎妹」比例的確是較其它地區為高。Marion J. Levy與費孝通等學者指出，小婚此婚姻模式的形成是起因於希望逃避大婚所需要的聘金有關。¹⁸這種婚姻模式也被指出是中國南方沿海從事於移墾開拓的漢人和被其同化的南島語系族群之間互動的產物。¹⁹除了經濟與族群性的因素以外，臺灣小婚形成的要素和大陸並不一致，尤其在北臺灣地區，大量的童養媳婚是與 1850 年以來北臺灣高度的商品化社會使然，婦女(母親)往往利用此一婚姻形式去尋找她們的利益，希望兒子的媳婦也是

¹⁷ 莊英章、武雅士，〈華南地區的婚姻形態(1930-1950)〉，《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8)

¹⁸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見，Arthur Wolf and Huang Chieh-shan,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80), pp.261-271.

¹⁹ Arthur P. Wolf, "The origins and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1989), in Kwang-chih Chang, Kuang-chou Li, Arthur P. Wolf and Alexander Chien-chung Yin ed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aiwan Area: Accomplishment and Prospect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9), pp.241-260.

兒子母親的女兒。²⁰因此，廣泛的華南區域內部各地方的婚姻模式，必須面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指出了「家庭選擇某一種婚姻形態的動機，與表達其族群或方言群的認同無關，反而與其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有密切的關係」。²¹也就是說，小婚/童養媳婚的起因與地區性的經濟條件有關，在北臺灣地區，此一由經濟條件制約下的婚姻制度又轉化並發展成爲一種文化上的習俗，其中頭份陳家的例子便指出，童養媳婚也可以提早建立二個家族之間的社會網絡。也就是說，研究者所指出的小婚/童養媳婚與族群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也與原來爲了避免大婚聘金的經濟性壓力不必然有關。除去這些對特定族群與經濟性的考量以外，北臺灣地區的小婚仍是值得觀注的，因爲這些比例相當高的小婚模式，可以針對家庭運作的經濟倫理進行文化上的思考，也有助於我們將女性的人身流動背後母女關係，作來一個探討。小婚/童養媳婚背後整個社會對於「女童」的人身買賣，是反應了某種特有的集體心態，此一集體心態對女童的養成所造成的影響是相當值得討論的問題。

四、重要發現

研究發現受訪敘事特點有三：一、以系譜的圖像式思維將自己安置在以家庭爲中心，此一家庭的概念即是以血緣與婚姻所搭建起來的關係網絡，內容包括童年中的父母以及婚姻階段的夫妻與母子關係。二、「勞動」在她們生活佔有幾近宗教性的核心價值。三、對自我生命史的描述具有絕對的主觀性以及特有的情緒表達方式，客觀的時間與地點以及歷史事件，在此都顯得極爲不重要。

女性談論歷史的方式是有別於正統的大歷史論述。在口述訪談計劃中的受訪女性而言，她們對歷史的觀察與描述也是類似的，甚至在某些情緒的表達更激烈、更隱晦、有時則顯得更抑制與更傳統。女性特有的談話方式、情緒表達以及與談話互動關係是值得注意的。²²尤特殊的是，她們談論自己的歷史時，著墨較

²⁰ 莊英章與武雅士合著，〈臺灣北部閩客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一個理論假設的建構〉，莊英章，《田野與書齋之間：史學與人類學滙流的臺灣研究》，頁 359-371。

²¹ 莊英章、武雅士，〈華南地區的婚姻形態(1930-1950)〉，《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8），頁 32。

²² 江文瑜，〈口述史法〉，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臺北：巨流圖書出版公司，1996），頁 149-170。

多的是與受訪者有關的「女性集團」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自己的母親、母親的養母、自己的養母、養母的養母等之間的親養及「買賣」關係。

在描述自己時，受訪者多會從父母親談起，接下來，會著重母方一方的描述，她們稱母親為「我媽媽」，外祖母則為「我媽媽的媽媽」。關係的連結是建立在女性關係網路之中，一步一步地從一個女人跳到另一個女人的方向。在這個談話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意識到受訪者以自己為主，但卻自居於最邊陲的角色來描述她和別人的關係。有意思的是，這種既核心又邊陲的說話模式，道出了受訪者自年幼到老年，在家庭之間及家戶內部中建立人際關係時的方向與態度。我們將口述訪談的內容歸納到以下的幾個主題來談。

母親、養母與婆婆-----以女人為軸線的討論

受訪者談起童年的生活時，女性集團的歷史、維繫在她們之間的人身買賣關係，以及此一關係的生活經驗，是受訪者著墨最多的主要話題。受訪者在談及其童年之時，大多是沿著女性/母親的軸線往前追溯，主軸是母親的母親、養母、姐妹等等，沿著此一主軸的重要話題便是生育、養育與「買賣」，不論是自己或是母親被買賣的經驗。幾乎所有的女性都談論了女性在女童階段在家戶中密集勞動的情形，或是被「賣走」的經驗。這種被賣走的經驗，有的發生在自己身上，有的是她們的母親、姐妹、養母本身、母親的母親等等。這種敘事內容隱藏著其它細節與故事內容，說明的是女性共有的集體經驗。許多童養媳在較晚，約五歲、六歲，有的十三歲才被賣走，在童年時便有強烈地「逃走」的念頭，雖有有的成行，有的還是留養家。「逃走」形成了跨越年齡、階層與地域的一種集體心態。這種「反抗」的集體心態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潛在女性系譜之中的傳統，也可說是在這種「買賣」婚制下悄悄地形成的一種集體心態。

母女關係

母女關係是受訪者著墨較多，但最不好談的部份。這種母女關係與其說是血緣性的，毋寧說是她們將身邊的女性集團當作是維繫她們個人的故事的框架來突顯其一生經歷的關係領域。大多數的訪談者是不斷地透過母親、養母、母親的母

親、養母的母親、先生的母親等這種以女性為核心的歷史關係網絡編織起一個龐大的系譜關係。一位受訪者以比較理性的態度分析自己的母親時，她說：「因為我母親缺乏母愛，所以比較嚴厲。」她從自己母親的童年追溯到何以她的母親對她總是比較嚴厲。

我們可以假設，在一個社會中，女童是從自己母親身上學習扮演母親的角色，而實際上，在我們的訪談的九個案例中，受訪者對母親的印象往往是輕描淡寫，甚至有的不是很清楚，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面向。舉例來說，案例一的受訪者幾乎沒有談到自己的母親，只有在養家的痛苦經驗。案例三的受訪者因為從小就被賣出來，只知母親還當過國小老師。案例四的受訪者並非童養媳，但也很少提及她的母親。只有提到「工作中的母親」很辛苦。案例五則說：我對我爸媽沒有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我媽，因為我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案例七則說：「我對她不是很理解，因為我很小就被賣出來了。」這些經由整理後訪談資料，大多顯示了她們對母親是「沒什麼印象。」母親的形象在這種零碎的關係系統中是很模糊的。

由於女性是從母家被送到夫家的，當我們在談她們的生命史時，女性談話的方式總是往現在身處家戶相逆轉的方向追溯。尤其明顯的是，她們在談她們的母親之時，受訪者可以追溯出極為驚人的系譜關係，諸如，她會談她母親的母親，以及母親的姐妹。如果受訪者是一個童養媳，除了在現有家戶的脈絡談其養母，以及養家的阿婆(養家父親的母親)以外，她也會悖離此現有家戶的場域談養母的生母以及她被收為童養媳的歷程。談話的話題與關係的描述是沿著所有的女性母系的路線追溯，雖然核心的主題是依附在家戶的範疇，但談話時必須不斷地在悖離現有家戶的系譜中延伸受訪者生命來源以及其女性關係人的來源，使得談話的內容不斷地挑戰了現有家戶模糊又糾葛的界線。

童養媳、原生家經濟與勞動力

在訪談中，我們發現，是否將女兒送給別人，與母親懷孕時是否有能力照顧這些接連而來的小孩有關。這種能力不是母親個人單方面的，而是與其家族成員

多少有關，家族成員多者，可以相互支援協助育嬰的工作；母親身體健康與否也會影響到她們是否有能力育嬰。在我們訪談的個案中，顯示了有的家庭經濟條件好者也一樣會將女兒送給別人作為童養媳。案例八中，受訪者本身便是新竹地區經濟條件很好的「地主」之家，受訪者的母親育有約十一個子女，其母親至少送出二個小孩給別人。同時，我們也發現受訪者中，也有很貧窮的家庭，但是會將自己親生的兒女扶養長大，原因是家裡只有兄弟，沒有女兒，受訪者是惟一的女兒。其它的例子顯示，買一個童養媳入門，會送走家裡一個女兒，這與家裡經濟因素似沒有直接的關係，反倒已是婦女生有女兒以後很自然一種文化反應。

婦女勞動在家戶經濟中的角色是值得注意，雖然，我們在前面已經注意到造成童養媳婚的主要因素，不必然是窮苦人家的婚姻選擇，而是已經形成的文化性的條件使然。但是，我們仍不可小窺這背後的經濟性考量。有的父母考慮將女兒留在身邊也不可說不是經濟上的考量。尤其是我們將時代性的因素納入考量，我們發現，國民基礎教育成為一個普遍的國家型計劃之時，家裡的男孩可能被送去受教育，但農村社會中，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總有許多瑣碎但不可不作之事，便由女童來從事這方面的勞務工作。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女童被送出去作為童養媳時，她是被送到一個較廣大的交換市場，進行商品化買賣。而女童留在家裡，也同樣要負擔許多的家庭勞務。二者後果幾乎是類似的，不論是否有被送出去，女童在家裡成為傳統勞動力的付出，她成為一個沒有固定給付的長期勞動力來源。差別的是，對家庭情感的認同會在某個程度化解這種勞動力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婆媳之間的爭執，也往往對於勞動力付出的認定不同，不論是童養媳年幼時被嫌棄的經歷，或是一般媳婦在操作家務及生育養育下一代的勞動力付出的感受，都明顯地表示著維持家庭需要的勞動力缺乏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家戶內部女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奇怪的是，我們較少聽到受訪者對家戶男性的抱怨，反而是在家戶中女性集團內部進行更多細節的描述。原因很可能是男性具有固定的勞動工作，也可能是男性完全不是她們生活中要競爭/妥協的對象，所以不在討論的脈絡中。不論是何者，女性勞動力是不在自由市場經濟的脈絡下進行的，她隸屬於

傳統的勞動力，在家戶中，或是以被買斷的交易下沒有薪資的勞動力，而操作此勞動力的原則是一種權力的支配，而不是貨幣或商品的價值可以估量的。

五、 結論

在這幾次的訪談經驗來看，婦女此自我憐憫之感，可說是農業為主的父系社會中，女性集團內部一方面流傳著「被賣走」此既定的威脅，同時也必須在承擔家庭勞動時，在女性集團內部的支配與競爭關係中尋求一席之地，不論是成或敗，女性都無法逃脫成為家戶經濟的最後一位支持者的角色。在某個程度上來說，女性的角色與臺灣當時所正面臨的大環境有關，諸如日治末期一般老百姓生活普遍存在著物資缺乏；農村面對經濟轉型之時，家戶必須以土地生產的剩餘價值爭取最大利潤，以致勞動力成為最直接被高度利用的資源。婦女，不論是母親、女兒或是媳婦，遂成為留在家戶的單位中，作最後努力進行支援工作的一群生產力。當然，階層性的問題在某個程度是存在的，但卻不是很明顯。也就是說農村中的地主之家，婦女參與勞動並不是不可能之事，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這裡有關家庭經濟與大環境發展的相關議題，仍有待更多的研究評估方可能有更細緻的分析。這個方向的理解，有助於我們對客家婦女地位以其家庭結構性經濟因素的角度來進行理解。

六、關鍵字

客家婦女、口述歷史、母女關係、家庭勞動

**山歌記憶與生命史敘述：
日治、戰後初期(1895-1955)竹塹客家女性民族誌研究 (1/2)**

簡美玲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劃之目的在描述及探討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1895-1955)，北台灣客家村落的婦女聽唱客家山歌的集體或個人記憶。經由環繞著聽唱山歌的女性經驗，及生命史敘述，以對日治台灣的北部客家村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及個人較為私密的情感或情緒世界，有探討的可能性。因此，從客家婦女的山歌記憶，來回溯在她們的生活、生命經驗所經歷的事件，並由此做為中介，表達出她們的自我感受，這是本研究計劃的核心關懷。

在第一年的研究，我們以生長經歷過此歷史時期的竹塹客家婦女口述聽唱客家山歌的經驗與記憶，來追溯客家女性的個人生命史。我們在苗栗地區進行了十多位婦女及四位男性的生命史訪談。這些生活過日人殖民至戰後初期的個人敘述(personal narratives)裡，陳述了在他們的記憶裡，客家山歌是怎麼的被唱，怎麼的被談論，在行動及態度上如何與她們個人由童年到年老的個人生命史及日常生活經驗關聯起來。而在男性的敘述裡，我們則也聚焦於茶在地方社會的生產及變遷。後者對於瞭解北台灣客家女性的工作與山歌的關聯是重要的脈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著重在非戲班的一般平民聽唱山歌的經驗，從一個微觀的、女性的視野的角度，以客家山歌為媒介，並透過記憶的建構，來描述及探索台灣的殖民歷史經驗與個人生命歷程之關連。本計劃在第一年的執行，著重生命史等深度訪談，客家村落民族誌田野研究。從客家語言的使用分布和客家戲曲的特性來看，四縣客語語群為選擇確定的目標，而竹塹地區的四縣腔又以苗栗縣使用密度最高，在這前提下在整個計畫的範圍縮小到苗栗縣進行民族誌田野研究。其中，以村落婦女和男性個人生命史訪談為主，頭屋村茶產業和歌謠情境之間關連的建

構為輔，主要的訪談和分析都是從個人微觀的角度切入。關於個人的生命史研究部分，第一年度在通霄、銅鑼、頭屋、公館和獅潭，共完成了十七位個人生命史的訪談，其中包含了四位男性。全部訪談錄音資料，我們已完成了五位的逐字稿。在這五份的個人敘述中，以通霄的羅家阿婆（1939-）和公館的黃家阿婆（1936-）的敘述來做經驗記憶的鋪成和比較，相較於其他三位，她們兩位的敘述是較完整的，涵蓋個人生命的重要經歷、山歌經驗和殖民記憶。因此，本研究計畫在第一年度的訪談分析，以她們兩位的敘述內容為主，對比出客家婦女對於山歌聽唱經驗的同與異，並進一步延伸出關於山歌、婦女情感和時代環境等問題意識的討論。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目前已出版的客家民族音樂的研究作品，大多著重在客家山歌的歌詞和曲調等內容的研究，對於聽者或整個社區對於歌曲的經驗等討論仍是較少。因此，由客家村落的民族誌脈絡，來探討山歌對於客家社區及意義，及個人或社區的聽歌或看客家說唱表演的主體經驗，是這個研究計畫的主要方向。

本研究的基本架構，在於由微觀、個人的客家婦女的聲音(voices)傳達她們生活在日治及戰後時期，對客家山歌記憶及經驗。但這些客家婦女的生命史敘述，被預設為不僅是表達個人獨特的觀點，並也是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人匯集的客家村落，與日人殖民、大戰、戰後的北台灣的政治脈絡，並且從當時的產業結構和商業流行文化等時代脈絡下，來突顯的主體經驗。這個研究以對客家女人與客家歌的關注，所希望做到的，就是由特定，隱微的部分，來瞭解一特定的殖民時代下，被凝結在女人的敘述及記憶裡的北台灣(竹塹)客家經驗。

四、主要發現

（一）、山歌與勞動經驗

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初期這段時間，在兩位阿婆的敘述中，都同樣呈現出必須不斷勞動的意象。她們山歌的學習和聽唱經驗，都來自於生活或工作場域，並強調山歌具有不斷對唱的特質，一來一往的變化除了趣味，更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我們認為山歌在茶園傳唱的必然性，不是因為歌詞中提到茶，而是在山林茶園勞

動時可自由地唱歌，互相應和，是娛樂亦為一種交誼，歌詞的變化只是溝通或傳達情感的中介。唱山歌對通霄的羅家阿婆來說是「暢快的」、「一直搭的」、「勸人一樣」與「好玩的」；公館的黃家阿婆認為唱山歌是「滿山唱的」、「做什麼都學唱」、「罵回去這樣」與「（和先生）有一起唱過」。這些對山歌不同的意識，均建立在工作場域中。因此，山歌和勞動經驗之間的關係，建構於傳唱的勞動場域與山歌自由的形式。

（二）、「流行」的歌謠

在訪談敘述中可以發現，兩位阿婆將客家山歌和客家流行歌區隔開來，主要因為客家流行歌有固定的唱詞，缺少了山歌該有的自由性。透過各種唱片和電台的聽歌經驗，對於她們而言都是晚近的事，就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這段時間，各種媒體雖然都已影響了山歌的形式和傳唱，但她們居住在鄉間，對於當時客家的流行歌，是「沒有能力」去感受的，主要原因是買不起唱盤機和收音機，能擁有收音機大多是 70 年代之後的事了。因此，對本研究而言，要探討當時的山歌聽唱經驗，不能用商業機制下的「流行歌」來看，而是必須用當時「流行」在工作場域的山歌概念來看，這概念是近似於羅香林所指的「風」－流行的歌謠。它是為一種普遍於工作場域，充滿各種變化，隨興地從人們口中唱出，表達了人們苦樂情感。

（三）、日治時期的殖民氛圍

日治殖民的這段時間，兩位阿婆的敘述，除了同樣呈現出必須不斷勞動的意象外，還包括經歷了躲空襲和面對警察的恐懼印象。為了家庭生活的維持，不管男性和女性都必須勤奮地工作，對於戰爭時躲空襲必須不斷移動身體的經驗描述，也表達出對於戰亂動盪的無奈。日治後期中日戰爭爆發，因而產生「皇名化運動」，當時不只禁止演出傳統的客家戲，山歌也是被禁止的。但法律上的禁令，在實際生活中並不會完全中斷山歌的傳唱。當受訪者在會回答關於日治「皇名化

時期」時禁令的問題時，同樣面對「禁止」一事，卻產生不同層面的關注。獅潭的郭家阿伯提到政權機制迫使的改變，使用了「官方」和「愛國劇」等字眼；獅潭的謝家阿婆則是關注家裡長輩的觀感，使用「家裡的人」來表示家中的反對。這種差異代表著兩種不同視野的觀看和記憶，這兩種方式呈現的背後，有著不同的意涵。從概念的認知、運作到訴說，這突顯出不同個體的生命經驗的差異，並且牽涉到如何被記憶和重新述說。

五、結論

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初期這段時間，通霄的羅家阿婆和公館的黃家阿婆兩人的生活經歷，都包含必須不斷勞動的意象，還有躲空襲警報的恐懼經驗。她們山歌的學習和聽唱經驗，都來自於工作場域。因此，山歌和勞動經驗之間的關係，連結起傳唱的勞動場域和山歌自由的形式。對本研究而言，要探討當時的山歌聽唱經驗，有別於客家的流行歌，必須放在「流行」在工作場域的概念來看，這概念是近似於羅香林所指的「風」－流行的歌謠。它作為一種普遍於工作場域，隨興地從人們口中唱出，藉此表達人們情感依歸。

Mary Romero and Abigail J. Stewart (1999)在討論女性和故事述說之間的關係時，認為當女性在述說自己生命的過往，不只表現出外在文化環境對她的影響和形塑，更傳達自己私人的故事如何具有社會意義。在日治殖民的情境下，殖民政府後期對於山歌的各種禁令和規定，客家婦女透過自己的生活經驗來重新表述時，是有別於客家男性用「官方」或「愛國劇」等字眼來訴說，而是用「家裡的人」的字眼，兩者同樣傳達「禁止」的大時代氛圍。如何再現及解讀這批微觀的個人口述資料，並進而探討山歌、殖民與北台灣客家山區地方社會裡的女人之日常及生命史經驗的關聯，是本研究計劃第二年的重點。我們預期由此交織的客家女性生命史經驗，及殖民歷史的特定敘述層面，能對我們所訪問的客家婦女所曾經歷關於客家山歌的經驗和記憶，提出有效的描述和分析。

關鍵詞：敘述、殖民、山歌、客家婦女、日治台灣

成果摘要

竹塹客家三腳採茶戲的傳統與創新

—以「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與「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為例

段馨君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研究目的

台灣客家採茶戲自清末盛行於台灣北部桃、竹、苗一帶，隨著表演生態的改變及社會、經濟的變遷，台灣客家採茶戲亦有吸收不同劇種的表演形式，朝著成熟的劇種形式發展。然而，面對現今的社會，採茶戲的發展再次面臨如何迎上現代化的腳步且能兼固傳統，是現今採茶戲團一大課題，本計畫立意在於探討他們是如何站在傳統的基礎，企圖走出創新的風貌。

二、研究方法

在發展本土文化思潮下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為延續客家文化，客家採茶戲日漸受到發掘與保護，不僅調查彙整現今仍活動的客家戲團，固定舉辦活動，推廣客家戲劇的表演文化，對於傳統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的劇目整理重現，透過民間劇團或社區團體來保留與傳習。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參觀觀賞、訪談、分析劇目等研究方法，論述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如何在現代舞台結合科技展現新風貌。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對於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的研究，首推陳雨璋《台灣三腳採茶戲賣茶郎之研究》與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之研究》，這兩本著作對於本研究之撰寫，極具參考價值，文中對於客家三腳採茶戲的源流、在台灣的發展、《張三郎賣茶》劇目十大齣分析、音樂曲式、文武場的編制，均有詳細的描述。鄭榮興對於台灣

客家三腳採茶戲為適應表演場地，對於劇情而有增修外，對於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如何現代化而又能兼具傳統，尚未提及，故此為本研究之目的。在研究對象的選定，在現今的客家戲團中，〈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和〈榮興客家採茶戲團〉，兩者對於傳統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的整理與傳承均有其意義。本研究將兩劇團依其經營模式、表演方式、其它三大項，再細分成數小項分析。兩者均曾搬演完整的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十大齣，故為本研究分析範圍內。文末對於延伸於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發展的客家採茶戲的兩齣新編戲目，結合客家移民研究、客家文化產業的論述，分析《風吹桐花香》及《羅芳伯傳奇》兩齣戲的意義。

引用池永歆在「地方的文化意或模仿地方的文化—文化地理視域下的客家桐花祭」一篇文章中，以段義孚（Yi-Fu Tuan）的空間與地方的文化地理理論，與布希亞(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理論探討客家桐花祭。本研究計畫除以歷史溯源探究客家三腳採茶戲之源流與行當曲目文武場等之外，並以「榮興客家採茶劇團」、「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列為主要觀察與研究對象。

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第二部分為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之源流發展及表演形式之概述。第三部分為研究團體的比較並分析即對其所搬演的《張三郎賣茶》系列分析論述。第四部份即分析客家採茶戲《風吹桐花香》及《羅芳伯傳奇》兩齣劇目的劇情分析，劇中所反映與當代思潮的文化意義。第五部分結論。

四、重要發現

（一）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表演形式概述

傳統台灣客家三腳戲是以一旦、一丑或二旦、一丑的行當，故稱採茶三腳戲。主要是搬演《張三郎賣茶》故事。其演出場地都為落地掃。日治時期商業劇場的盛行下，為了劇場演出的需要，在《張三郎賣茶》的故事基礎上發展成十大齣戲

目，亦增加《拋採茶》、《扛茶》的表演形式，不僅考驗演員的技藝也增加與觀眾的互動。在音樂上多以客家山歌、小調為主。在樂器的配制上是以拉弦樂器和敲擊樂器為主。在現今的廟會活動甚少搬演，主要活動於客家文化或戲劇活動中。

（二）研究團體之比較

〈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以傳承演出客家三腳採茶戲為主，團長徐敬堯，學員多來自對於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有興趣的民眾。成立至今，受邀於國內、國外文化節及國內大學、文化中心演出。演出作品以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張三郎賣茶》的劇目為主，略有改編，未有新創劇目的出現。客家三腳採茶戲雖以「四縣腔」為主，但因演員大都操海陸腔的客語，故有時候演員會不由自主的以海陸腔練唱，因此會呈現出兩種不同腔調的客語在同一舞台上。文武場編制簡易、道具、布景、舞台燈光甚少。演出場地多為落地掃或野台。未來展望是希望保存、傳承客家三腳採茶戲及創新，能將演出作品製成 DVD 出版，每年有一齣新創的新戲並能夠巡迴全省或出國表演。

〈榮興採茶戲團〉成立於民國七十六年，鄭榮興為創團團長，現職為台灣戲曲學院校長，致力於傳承與推廣客家戲劇，是為職業戲團，故除了文化場次的邀約之外，也接受民間廟宇或慶典的邀約，甚至將其領域擴至電視戲曲的活動製作。演員組成老、中、青三代。〈榮興客家採茶戲團〉雖以搬演客家戲曲為主，但其揉合京戲的表演程式，再創造客家採茶戲之風格。演出作品眾多，無論是在國家劇院、廟宇慶典的場地，都運用現代劇場的概念，有專門的道具、布景及燈光設計的團隊配合。在未來的規畫上，希望能將所表演的劇目能製成 DVD 出版，國家能夠成立客家採茶戲團。

（三）《張三郎賣茶》系列演出之比較

在傳統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的劇目的整理上與搬演上，兩者均在《張三郎賣

茶》故事、音樂曲調的架構下進行，保持原劇目的情節。〈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主要是以莊木桂先生所收藏的手稿為「重現」的依據。裏面所有的音樂、曲調、唱詞可對照徐進堯所著《客家三腳採茶戲的研究》（育英出版社），〈榮興客家三腳採茶戲團〉的劇目整理主要以曾先枝所整理範本為主，鄭榮興依劇情的需要改編，其所編排的劇目、音樂的運用，在其著作《台灣客家三腳採茶研究》（慶美園文教基金會），有詳細的說明。

然而在演出形式與場地上，〈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的演出可視為，台灣三腳採茶戲落地掃時期的演出形式，簡易的文武場編制，服飾、道具多為日常生活中可取用之物，演員多為業餘演員。〈榮興客家採茶戲團〉的演出則是進入內台時期，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所搬演的模式。完備的文武場編制、可依劇情的需要與非劇中人搭腔，所運用的道具為傳統的劇場模式，進出場、路線的行徑有其規範。演出風格上〈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的所呈現的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如同歌舞小戲，歌者必舞，演員身體極富律動性，彼此的默契十足，表現出市井小民詼諧逗趣的一面。〈榮興客家採茶戲團〉因每位演員均有其他劇種訓練的背景，因此音域、動作的表現上，表現出不同的風格，較著重在戲劇情節的進行。

（四）客家採茶戲—《風吹桐花香》、《羅芳伯傳奇》分析闡述

〈榮興客家採茶戲團〉除了應邀請單位所託，演出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的戲目外，其大部份時間所演出的戲仍以新編戲目為主。以《風吹桐花香》、《羅芳伯傳奇》為例，這兩齣戲均為〈榮興採茶戲團〉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之邀約，為客家文化藝術節所編排的節目。兩者的特色為在符合活動內容的主題下，重新編劇、編曲、編排表演程式，結合現代的劇場，所呈現的客家戲曲的表演藝術。與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相較，戲劇的編排、音樂曲調、表演程式、服裝道具、舞台設計均走向現代劇場的演出模式。將故事情節分為十個段落，每個段落雖有主

題，但已非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般，每個段落可成折子戲單獨演出。

在新編戲中每個主題是連貫的，如同章回小說般，前後連續。運用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的曲調與客家山歌，甚至借用它種劇種的音樂曲調，因劇情需要從新編曲，不限專戲專曲。棚頭與唱念融於劇情內，增加劇情的豐富性。行當的增制與大量的表演程式的編排，幫助劇情的進行。服飾造型因劇中人的身份，有專業工作人員設計。寫實的布景，隨著情節的進行，更換不同的場景。燈光設計，不僅可以營造戲劇所需的氛圍，也可切割空間的運用或突顯劇中人情緒的表達，從傳統的三腳採茶戲到客家採茶戲，不論是「重現」或新編，客家戲曲在藝術的展現上必與現代劇場結合，即使是以外台場地演出，也即是如此，這是時勢所趨。

五、結論

在全球化下，本土的台灣客家戲也在傳統中見創新，劇場客家戲如「榮興客家採茶劇團」不論是在現代劇場演出或結合觀光旅遊季在廟會的野台戲，也採用如歐美劇場的布幕與景片設計來做場景變化，並加入音效與燈光設計。在演出音樂上主要是客家山歌為主，旁採其他劇種的曲調為輔。以客語四縣腔為主，唸白中多存有客家俚語、相關語，或加入現代的詞彙，讓劇情帶有活潑有趣詼諧感。當代客家戲劇經由不斷改良戲後，為符合後現代主義與資本經濟的市場效應，所呈現的多元文化拼貼混搭，這種特殊視覺文化中的影像經濟美學，可推廣至國際，成為台灣劇場藝術的特色之一。

關鍵字：採茶戲、張三郎賣茶、榮興客家採茶劇團、霓雲社客家三腳採茶戲團

成果摘要

客語學習系統之製作

陳信宏

(交通大學電機學院 電信工程系教授)

本計畫完成了一個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系統，讓使用者使用漢語或客語語音輸入來查詢客語諺語及歇後語(師傅話)，再將漢語或客語解釋以語音輸出給使用者聽，可作為客語學習之用。系統中使用了漢語語音辨認、客語語音辨認、漢語文字轉語音、客語文字轉語音四項技術，其中客語文字轉語音是本計畫之研究重點。

1. 研究目的

在現今資訊時代，使用語音科技於語言學習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過去在客語語音處理上的研究相當稀少，我們前兩年由客委會贊助，開始了客語文字轉語音的研究，發展了一個客語文字轉語音雛型系統，本計畫之目的是持續改進此系統及發展客語語音辨認技術，並結合漢語語音辨認及漢語文字轉語音技術，整合開發一個客語學習系統，先以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做展示，未來可進一步擴充系統功能及加入自動評估機制，發展為完整的客語學習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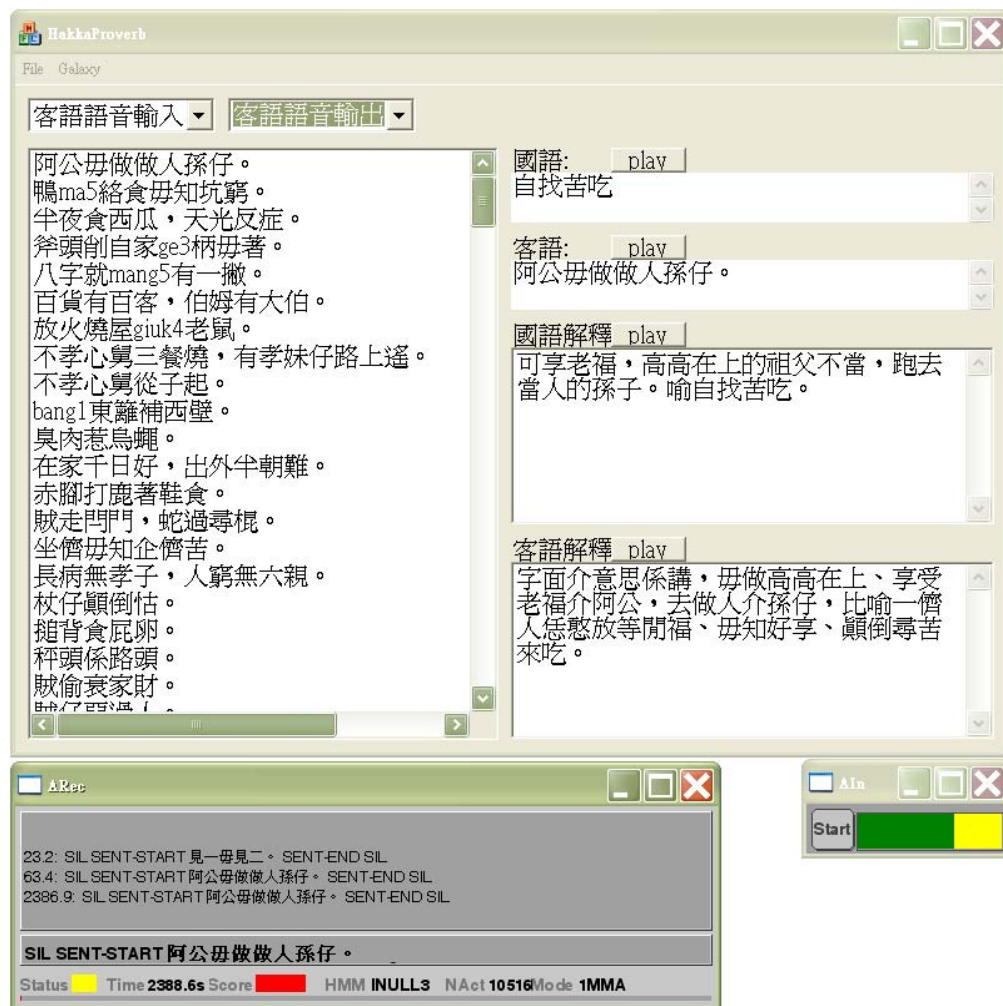
2. 研究方法

本計畫發展的「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系統」是一個可由漢語及客語語音輸入來查詢客語諺語及歇後語之系統，在由語音輸入查詢到某一筆諺語或歇後語後，便將所對應之漢語或客語解釋以語音合成系統朗讀給使用者聽。本系統是一個基於 MIT 提供的 open source 軟體 Galaxy infrastructure 的分散式系統，它由四個獨立的程式組成，藉由 Galaxy infrastructure 所提供之功能互相溝通，這四個程式分別為漢語語音辨認器、客語語音辨認器、Galaxy Hub 以及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模組。

漢語/客語語音辨認器是以 ATK 為基礎之即時語音辨認系統，客語辨認的詞彙為客語之諺語和歇後語，漢語辨認的詞彙為客語諺語/歇後語所對應的漢語中文短語，使用者可以選擇以漢語或是以客語進行語音輸入，在輸入後便進行即時語音辨認，並將語音辨認的結果藉由 Galaxy Hub 傳送至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模組，將語音辨認出的諺語/歇後語在資料庫進行搜尋，此資料庫含有這些諺語/歇後語所對應之漢語或客語解釋，最後系統可由使用者選擇以客語或漢語，將諺語/歇後語對應之解釋以語音合成器朗讀出給使用者聽。

完成之展示系統包含客語諺語及歇後語各 200 則，資料是由龔萬灶老師提供，它們都有漢語解釋，我們以人工書寫了 10 則的客語解釋，並做斷詞及音節

碼標示，初步測試結果顯示漢語及客語語音辨認效能極佳，漢語及客語之語音輸出品質也都很流暢，整體系統效能良好，系統之介面如下圖所示。



3. 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此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系統使用了四個語音處理模組：漢語語音辨認器、客語語音辨認器、漢語文句轉語音系統(MTTS)、客語文句轉語音系統(HTTS)，說明如下：

- λ **漢語語音辨認器**：以 411 個基本音節為基本辨認單元，我們使用 300 人的麥克風語料庫 (TCC300) 建立了 100 個右韻母相關聲母 (包含空聲母)以及 40 個韻母的 HMM (Hidden Markov Model) 聲學模型，聲韻母模型之狀態數分別為 3 及 5；在不使用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的情況下，此辨認器之基本音節辨認率可達 70%。
- λ **客語語音辨認器**：以 671 個基本音節為基本辨認單元，我們使用一個 35 語者的語料庫建立了 87 個右韻母相關聲母(包含空聲母)以及 72 個韻母的 HMM 聲學模型，聲韻母模型之狀態數分別為 3 及 5。
- λ **漢語文字轉語音系統**：它為我們過去所發展的 MTTS 系統，可將任何輸入

的文句轉成流利自然的語音輸出，它的運作方式是先將輸入文句做 Tagging，包含斷詞及標示詞類處理，它使用一個 11 萬詞的詞典，以長詞優先為準則，並考慮一些構詞規則，我們由斷詞結果來產生音節碼，用以找出基本音節樣本波形，並且由斷詞及詞類標示結果抽取一些語言參數，用以產生韻律信息；韻律信息產生是使用遞迴式類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由輸入的語言參數產生音節的基頻軌跡參數、音節能量位準、聲韻母長度及音節間停頓長度；最後再使用 PSOLA (Pitch Synchronous OverLap Add) 合成法，調整基本音節樣本波形的韻律信息，以產生自然流利之合成語音。

λ **客語文字轉語音系統**：採用我們前兩年客委會計畫所發展的 HTTS 系統為基礎加以改進，它的運作方式和漢語文句轉語音子系統相同，文句分析使用一個 36,258 詞之詞典，以長詞優先為準則，斷詞正確率可達 80.3%，下面為一例子：

輸入文句：記得我看過一篇文章，它內容大約是講客家是中國按多民族中最進步介民族，客家婦女更是中國婦女最優秀介婦女。

輸出斷詞結果：記得(VK) 我(Nh) 看過(VC) 一篇(Na) 文章(Na)，它(Nh) 內容(Na) 大約(Da) 是(D) 講(VC) 客家(Na) 是(D) 中國(VH) 按多(Neqa) 民族(Na) 中(Na) 最(Na) 進步(VC) 介(VC) 民族(Na)，客家婦女(Na) 更(D) 是(VH) 中國婦女(Na) 最(Dfa) 優秀(VH) 介(VC) 婦女(Na)。

音節碼輸出：gi3 det4 ngo1 kon3 go1 it4 fu5 vun5 zong1 ta1 nui3 iung5 tai3 iok4
sii3 gong2 hak4 ga1 sii3 zung1 guet4 on3 do1 min5 cuk8 zung1 zui3 zin3 pu3
gie3 min5 cuk8 hak4 ga1 fu3 iui4 gang1 sii3 zung1 guet4 fu3 iui4 zui3 iu1
siu3 gie3 fu3 iui4

韻律信息產生也是使用遞迴式類神經網路，由一個陳碧娥老師錄製含 42,337 個音節的語料庫訓練而成；波形表含 671 個基本音節，由余秀敏老師以單音節朗讀方式錄製；語音合成使用 PSOLA 法；此系之效能良好，可將任何以客語漢羅輸入之文句轉成流利的四縣客語語音輸出。

4. 重要發現

由研究之結果我們發現由於客語和漢語的語言結構相當類似，過去漢語語音處理使用的以音節為基礎的方法大多可以直接使用於客語處理，包括：使用聲韻母為單元的 HMM-based 語音辨認、使用基本音節為合成基本單元的 PSOLA 語音合成、長詞優先的斷詞等；另一方面，由於客語 written form 並未統一，不同的人所寫的客語文章的遣詞用字並不一致，自動化的文字處理仍舊困難，要改善電腦自動化文字處理的能力，必須下很大功夫進行基本資料建置，包括：lexicon 的擴充、text corpus 的收集、文章斷詞/POS/音節碼標示、構詞規則的收集等；另外，speech corpus 的收集及處理也是促進客語語音處理技術發展的必備條件，這有待大家的共同努力。

5. 結論

本計畫已開發完成了一個客語諺語及歇後語查詢展示系統，讓使用者以漢語或客語語音輸入來查詢客語諺語及歇後語，並將解釋以漢語或客語語音輸出給使用者聽，初步測試結果顯示漢語及客語語音辨認效能極佳，漢語及客語之語音輸出品質也都很流暢，整體系統效能良好。未來可進一步擴充系統為完整的客語學習系統，需要進行的研究包括：客語大詞彙連續語音辨認系統的發展、客語文字自動處理的改進、客語 corpus-based TTS 系統的發展等。**關鍵字:**客語學習、客語文字轉語音、客語諺語、客語歇後語。

成果摘要

學院理論與地方知識的對話：田野工作室

莊英章講座教授、羅烈師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一、研究目的

本案係實作型研究計畫，藉由工作坊型式之運作模式，使不同社區的在地研究者之間以及在地研究者與學院研究者之間，在學院所構築的平台上，相互交流，從而使得學院與地方之學術社群垂直整合，兩蒙其利。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始於九十四年度，第一年採取推廣課程的模式，共有二十餘名學員完成前後兩期的訓練課程，該年度結訓時，總計輔導學員提出十一項研究計畫；本（九十五）年度進一步採取自選主題之聯合工作坊模式展開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分赴各工作坊與學員定期例會，以完成其研究計畫；明（九十六）年度則將再進一步採共同特定主題聯合研究之工作坊模式，藉由文獻蒐集、整理與研讀，以及田野調查，共同完成一項研究計畫。

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研究並非一般之主題研究計畫，因此並無所謂理論分析架構，然而，其基本概念有「理論」、「地方知識」、「工作坊」及「學術研究者」、「文史工作者」等。

所謂理論係指抽象層次較高、且普同於人類社會文化的學術研究假設；而地方知識則係社區居民所擁有的具體知識，而這一具體知識係以當地文化體系的形

式呈現。通常學院的學術工作者以理論為分析架構，而地方文史工作者則往往以地方具體知識為中心關懷，本計畫則企圖以工作坊的形式，建構交流平台，以建立垂直整合型的學術社群，以使二者相互結合。而且對於學院而言，這一整合學術社群亦係學院研究、教學及推廣等相關活動的助力。

四、重要發現。

本計畫實施兩年後，證實垂直整合學術性社群的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而且這種整合也確實對本院之教學、研究與推廣均有助益，今年度亦因之完成多項成果；然而，也存在著尚須克服的困難。條述如下：

（一）設置「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湖口田野工作室」

湖口田野工作室已於五月十四日成立，由湖口老街 193 號羅美堯先生無償出借八坪店面一間，基本布置及設備包含湖口老街及周邊社區的地圖、大事年表、桌椅及櫥櫃等。核心成員有四，分別為羅烈師、羅美堯、黃少蓉及郭廷珩。辦理活動方面亦如預期，在教學方面，大學部方面配合本校相關課程初級客語、客家社會文化、客家專題紀錄片製作及多元藝文賞析等課程之校外教學活動；研究所方面則已有東海大學公政行政在研究方面，計畫主持人近十餘年來長期研究湖口老街及其周邊社區，本年度之研究計畫「在歷史街區崛起：湖口老街香草花園咖啡廳的故事」亦順利完成，論文亦已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所之「全球視野下的客家地方社會：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公開發表；在推廣方面，設有三處展覽空間，推出「老街店主羅仁濟百年特展」、「臺陽美術學會羅美棧個展」、湖口古文書展，動態活動則有「寒夜影片欣賞」及與荒野協會新竹分會合作繪製湖口老街綠地圖。

（二）完成三個工作坊

本年度舉辦三個工作坊，首先為上年度參與推廣課程之學員所組成的羅瑞霞、羅文生、范振乾、彭麗晶及葉玉嬌等五人所組成的「新竹縣客家社會文化研

究工作坊」；其次為陳玉蟾、賴來甲、彭振雄、羅玉琴等所組成的「關西研究工作坊」；其三為李建新、陳明德、謝華英、黃秋燕、邱志賢、林律伶及謝瑞珍等所組成的「新竹市客語教師自我成長工作坊」，而其中後二者係從原推廣課程之「新竹縣客家社會文化研究工作坊」延伸而成。新竹縣研究工作坊共提出「花屯女與心白仔」、「竹塹社土目潘文起與九芎林」、「入寶山不要空手而歸」、「客家養生食補：糟嬖」等四個研究計畫；新竹市研究工作坊共提出「鐵道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新竹竹蓮市場的蛻變」、「被遺忘的河神：新竹的水圳」、「新竹市客籍校長訪問：詹良文」及「十八尖山植物客家名仔」等五個研究計畫；關西研究工作坊提出「從關西的傳統建築看過去、現在與未來」及「帽盒山上的寶藏：礦場故事」兩個研究計畫，而且這兩個計畫皆獲得新竹縣文化局之補助。三個工作坊共完成十一項研究計畫，並於十一月十九日於本院舉辦「當地知識與學院理論的對話：田野工作室」研究成果聯合發表會。此外，更有兩位參與學員考入本院今年新設之「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展開正式的學術研究生涯。

（三）限制與困境

本計畫今年伊始，即與「新竹縣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互動密切，計畫主持人每月皆赴該會新竹縣關西鎮北斗里光復新村一街一號之會址，參與相關學術研究活動。該會的核心成員為陳玉蟾、賴來甲、彭振雄與羅玉琴等六位，會務運作情況優良。本計畫亦擬比照湖口田野工作室之模式，與該會合作成立關西田野工作室，然而由於該會會址位置稍嫌交通不便，並不利於學院一般教學與推廣活動之進行，因此只得放棄於該處所成立田野工作室之計畫。

與此相反的情形是頭份蘆竹湳社區，本社區位於苗栗縣頭份鎮蘆竹里，舊名蘆竹湳，係與竹南鎮交界之處。歷來古文書所提中港地區分類械鬥之發生地「田寮」，即與蘆竹湳相臨，故本區為研究閩客關係的有利地區。本社區目前住戶為閩南人，以林陳兩姓居多，核心成員包含陳世政、林光文及陳天壽等人。陳世政等人先前已多次參加苗栗縣文化局所舉辦社區總體營造、社區記錄片及社區文化資產等相關課程，因此，期望能完成一本蘆竹湳社區史，以求進一步推動社區營

造工作。本社區承受劇烈之社會變遷，人口大量外流，擁有數量龐大的閒置三合院，實係觀察北台灣農村變遷的佳例，亦為建立田野工作室之適當地點。然而，目前該社區欠缺可以投入社區研究之人力，本計畫實質上無法投入額外人力協助其完成社區史，因此設立田野工作室之議亦告停頓。

五、結論

本計畫進入第二年計成立一處田野工作室，三個研究工作坊，實質參與人數超過五十人，並且完成十一項研究計畫，其中兩位考入本院在職專班，因此，對於計畫原初所擬定的「學術社群的垂直整合」研究發展方向，大致吻合，值得繼續投資人力與物力，以便強化此一社群之深度與廣度。

然而，本計畫原擬在新竹縣市普設田野工作室之構想，經一年之試驗，顯然有調整之必要。實體之田野工作室必須符合人員、交通、地點硬體及相關設備等諸多客觀要素，而且尚須依恃合作社區之主動配合方能達成，如果一旦廣設田野工作室，必然不符成本，因此本計畫將停止廣設田野工作室之基調，改從非實體的工作坊形式，強化與地方研究者之間的合作。

職是之故，下年度之工作計畫亦已大致擬定，且本計畫亦已獲得本校「跨領域研究計畫室」之補助，展開「客語學習系統之建立」及「客語網路檢定可行性評估」兩項研究計畫，同時以「學院理論與地方知識的對話：特定主題工作坊」為題，向行政院客委會提出第三年研究計畫，將置研究重點於義民信仰相關古文書整理、研究成果研讀及義民祭典田野調查等三方面。

關鍵字：文史工作室、客語教師、地方知識、田野工作室、學術社群之垂直整合